

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第十三期 二〇〇一年四月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台北・南港

目 錄



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十三期

主持人的話／蕭新煌.....	1
研究員通訊	
「菲律賓呂宋島北海岸考古調查計畫」研究計畫簡介／臧振華.....	2
「越南北部沿海地區考古調查」研究計畫簡介／陳維鈞.....	4
「清代中國救時東南亞國家難船的方法」研究計畫簡介／湯熙勇.....	7
「法國殖民時期的中越關係」研究計畫簡介／許立堂.....	11
「集團經濟與東南亞新秩序－1930年代上海、香港、新加坡之間 商貿網絡的變化」研究計畫簡介／李守平.....	13
「日本帝國內外地行政一元化下的印尼（1944-1945）： 以爪哇奉公會為比較研究」研究計畫簡介／蔡慧玉.....	15
「麻六甲都市的文化多重性與其歷史的形成過程」研究計畫簡介 ／黃蘭翔.....	18
「日本、南韓與東南亞的產業發展與貿易依存關係的比較研究」 研究計畫簡介／黃登興.....	23
「國際貿易新秩序下臺灣與東南亞的農產經貿關係」研究計畫簡介 ／張靜貞.....	24
「融合或衝突？馬華伊斯蘭近代發展初探」研究計畫簡介／朱滋源.....	26
「撰寫馬來伊斯蘭社會」研究計畫簡介／麥留芳.....	34
「國家、宗族與新加坡金門人的國家認同」研究計畫簡介／戚常丹.....	37
「攜手並進的市場與國家力量：變遷中的東南亞台商勞資關係」 研究計畫簡介／龔宜芳 王宏仁 張翰璧.....	40
「印尼『教士復興會』發展史」研究計畫簡介／游謙.....	44

「台灣與南海地區之衝突管理」圓桌學術討論會會議召開情形報告

／宋燕輝.....47



會議論文

談印尼伊斯蘭的再興：一位現代主義穆斯林的觀點

／Nurcholish Madjid 著 林長寬譯.....57

伊斯蘭與印尼華人的同化：存亡繼絕之道

／H. Junus Jahja 著 鍾凌峰譯 林長寬校修.....61

印尼伊斯蘭現代講述之途徑：一個ICMI之理念

／Muhammad 'Imaduddin 'Abdulrahim 著 邱炫元譯 林長寬校修.....66



新生代東南亞研究

「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博士論文簡介／邱秋遠.....75



東南亞與亞太研究機構簡介

香港城市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77



國內東南亞研究機構動態報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80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辦公室報導.....88



會議報導

2001年5~8月東亞及東南亞研究相關會議時間表.....92

Contents



Newsletter of th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o.13



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By Hsin-Huang Michael Hsiao.....1



News from PROSEA Researchers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Northern Luzon Coast in the Philippines
By Cheng-Hwa Tsang.....2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oastal Area of Northern Vietnam
By Wei-Chung Chen.....4

The Southeast Asian Shipwrecks around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By Shi-Yeoung Tang.....7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French Colonization
By Wen-Tang Shiu.....11

*The Bloc Economy and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The Commercial Networks between Shanghai,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the 1930s*
By Yu-Ping Lee.....13

*Indonesia in Japan's Movement of "Administrative Integration within
the Empire", 1944-1945: "Java Hokokai" as a Comparative Study*
By Hui-Yu Ts'ai.....15

Cultural Pluralism and Historical Formation Process of Malacca
By Lan-Shiang Huang.....18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rade Dependency among Japan, Taiwan,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By Deng-Hsing Huang.....23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s in Agro-Food Sector between
Taiwan and ASEAN under the New World Trade Order*
By Ching-Cheng Chang.....24

*Integration or Clash?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
By Hong-Yuan Chu.....26

Islamization and Malay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
By Lau-Fong Mak.....34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State: Quemoyans in Singapore
By Chang-Hui Chi.....37

Market Goes Hand in Hand with State: Changing Industrial

<i>Relations of “Taishang” in Southeast Asia</i> By I-Chun Kung & Hong-Zen Wang & Han-Pi Chang.....	40
<i>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hdlatul Ulama in Indonesia</i> By Chien Yu.....	44
<i>Taiwa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Roundtable Discussion</i> By Yenn-Huei Song.....	47



Conference Papers

<i>The Rise of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The Case of Indonesia</i> By Nurcholish Madjid	57
<i>Ethnic Chinese Assimilation in Indonesia and Islam</i> By H. Junus Jahja.....	61
<i>Develop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mong Indonesia Muslims</i> By Muhammad 'Imaduddin 'Abdulrahim	66



Research of the New Generation Researchers

<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sian Financial Crisis</i> By Chiou-Yuan Lu.....	75
---	----



Introduction to Overseas Institutes of Southeast Asian and Asia Pacific Studies

<i>Sou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ARC, H.K.....</i>	77
--	----



News from the Local Institutes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Graduate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i>	80
---	----



News from PROSEA Office.....



May ~ Aug. 2001 Calendar of Conferences and Meeting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92

主持人的話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主持人

我們在二十世紀有豐碩成果，面對新世紀，我們的腳步更穩健。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年的啟始，我們再一次請本計畫各分支計畫主持人、博士後研究學者一起為淡江大學和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研究生開授「東南亞區域研究專題」，課程內容從東南亞政經研究到文化藝術一一含括，學生反應熱烈。

我們同時舉辦數場研討會。二月上旬我們和中研院歐美所合辦「台灣與南海地區之衝突管理」圓桌學術討論會，關於這場研討會，本期通訊有一篇宋燕輝教授的研討會側記。接著二月下旬和英國經濟與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ERC）合辦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and Culture in Global and Local Contexts。緊接著在三月主辦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arties, Leadership, and Governanc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四月又和中研院社科所等單位合辦「第四屆世界海外華人學術研討會」。

除了研討會外，中國大陸學者王逸舟和張錫鎮於二月在本計畫發表專題演講，就中國大陸東南亞研究現況和中國外交政策趨勢和本計畫研究同仁交換意見。

2001 年伊始，我們所舉辦的一系列討論會，這些學術活動相信都有助於讓本院東南亞研究領域更開闊。

「菲律賓呂宋島北海岸考古調查計畫」

研究計畫簡介

臧振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台灣與東南亞地區古代文化的關係，是研究華南、東南亞與太平洋等地區考古學和文化史的學者長期關切的問題。這個問題固然關係到台灣本地史前文化和原住民族來源的探討；在整個南島語族起源的研究上，亦具有極為關鍵的重要性。而在此一問題中，台灣與其近鄰菲律賓之間的史前文化關係，更是受到學者的注意。過去，許多有關南島語族起源和擴散的理論，均以此一關係作為出發點（如 Bellwood, Blust, Thiel 等人的論述）。然而，可議的是，這一關係以往並未經過考古學的充分驗證。

為了探討此一問題，臧振華自民國 85 年起，在本院東南亞區域計畫的支助下，與菲律賓國立博物館考古部合作，共組考古隊，展開菲律賓呂宋島北海岸的田野考古工作。這是一項須要長期進行的工作，區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考古調查。由於此一地區泰半是屬於考古學的處女地，以往所發表的考古資料零散，而缺乏系統；因此，第一階段考古工作的主要目的便在於進行有系統的考古調查和發現考古遺址，建立其文化年代學及文化類型學的基礎資料。然後再針對問題，選擇在時間和空間的軸線上選擇關鍵性的若干考古遺址進行第二階段的考古發掘。

民國 85 年，考古隊首先進行了呂宋島北海岸 Cagayan 下游河谷地帶的考古調查，共調查和發現了 52 處考古遺址和地點，並在 Naguilian 遺址作了試掘。次年，繼續進行呂宋島 Aparri 和 Laoag 之間的海岸平原階地和阿布盧 Abulug 河谷下游的調查。共發現遺址 45 處。依據對這將近一百處遺址的文化遺物分析和碳

十四年代的測定，初步建立起呂宋島北海岸史前文化年代學的時、空架構，包含從「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早、晚期以至鐵器時代的四個文化層次的年代和其空間分佈模式。

民國 87 年，「菲律賓呂宋島北海岸考古調查計畫（第一年）」，展開第二階段的考古發掘工作。首先選擇 Muguel Supnet Shell Midden Site 和 Leodivico Capina Site 兩處遺址進行了發掘。其目的，一方面是要從遺址的地層堆積中，驗證此一時空架構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是要從個別遺址中發掘出更多的文化遺物和遺跡，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資料。

這兩處遺址的發掘結果，一方面從年代學上肯定了前一階段考古調查所獲致的結果，另一方面，對年代在五千年以上的打製石器所代表的文化內涵有了更多的認識。但是其中也有若干問題有必要進一步釐清。所以，本計畫以後二年，擬繼續就此二遺址及其周圍的其他相關遺址作進一步發掘。

民國 89 年 7 月起，本計畫繼續執行「菲律賓呂宋島北海岸考古調查計畫（第二年）」的研究工作，在 Nagsabaran 遺址進行發掘，探討被考古學者視為是代表南島民族早期移民的帶紅色色衣陶（red slip pottery）遺址的層位和年代問題，獲得了相當重要的資料和線索。為了進一步瞭解此遺址史前聚落的發展和文化變遷，90 年度擬繼續進行 Nagsabaran 遺址更大範圍的發掘工作。

「越南北部沿海地區考古調查」研究計畫簡介

陳維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東南亞是一個佔地面積廣大的地區，在史前時期的不同發展階段中，各自呈現不同的文化面貌。從現今的民族分佈來看，眾多而不同的族群分散在東南亞各地區。這個現象是近代遷移的結果？或是東南亞地區各族群的差異性有其悠久的傳統？越南北部沿海地區考古調查研究計畫的主要目的，就是運用考古學田野調查的方法，來檢視越南北部沿海地區的考古學資料，包括考古學文化的內涵、聚落分佈的型態、生業適應的方式、文化變遷的模式、以及文化互動的關係等。並以獲得的資料，用來比對大陸東南沿海地區、以及台灣本島出土的考古材料，以便做更進一步的比較研究。本研究計畫的結果對於若干台灣考古學的重大研究課題，如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問題、史前族群互動的問題、以及對於台灣與鄰近地區相互關係的研究等，都將提供有意義的比較資料。

東南亞地區，在考古學上，是一個不可區分的研究實體。它蘊藏著豐富的考古學資料，對於各種現代考古學研究的重大課題，都有其重要的貢獻與成就。更者，東南亞地區的考古學資料顯示史前族群相互間，具有密切的互動關係。這些族群，不僅所處的地理環境類似，他們表現的生業適應方式也大致相似。因此，東南亞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研究實體。在這個基礎下，一個宏觀的亞洲視野、或亞洲觀(Asian Perspectives)，對研究東南亞地區的考古學是絕對重要的。唯有如此，才能打破現代政治疆域的有形壁壘。

藉由計畫的提出與執行，本研究將持續與越南國家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心考古研究院，進行整合性的泛地區考古學研究。希望能夠打破因為語言、政治疆界的限制，所造成的考古學資料無法比對的缺失。本研究將針對考古遺址在時空架構下的分佈情形，探討自然環境的變化，例如全新世海進海退現象，對史前族群在

生業型態及聚落型態的影響與限制，以及史前族群適應和變化的過程等。

越南地區的考古學工作開始於本世紀初法國佔領期間，至今已快超過百年，考古學資料累積龐大，研究結果異常豐富，尤其是越南北部地區。可惜因為語言的隔閡（其中大多數考古學文獻都以越南文發表）、以及戰亂等因素，外人很難能夠一窺究竟。因此本計畫的目標，旨在打破政治疆界，著手進行實際的合作研究工作，期能：

一、重建此一地區過去的文化史和生活史，如生業適應、聚落型態等；

二、瞭解此一地區內，在時空架構下，各考古學文化的相互關係，如互動關係；

三、進而瞭解此一地區內，文化變遷以及文化過程的原動力。

本計畫的研究重點，將著重於對越南北部沿海地區考古學資料的掌握，尤其是所謂的「後和平文化」（post-Hoabinhian）的考古學文化的變遷和發展過程，包括考古學文獻、自然與人文環境背景、考古遺址的空間分佈、物質遺留、以及生態遺留等。期能針對下列議題進行深入探討：

一、與台灣本島大坌坑文化有關的 Hoabinhian/Bacsonian（和平/北山文化），其間的關係為何？

二、越南北部沿海地區考古遺址的分佈與全新世以來海進、海退的相互關係為何？

三、越南北部沿海地區考古遺址的生業適應方式為何？

四、越南北部沿海地區與華南地區的考古遺址間在時空架構下的相互關係為何？

越南北部沿海地區的考古學研究，基本上，其時空架構、以及發展脈絡，經過長期的研究，已有相當的認識。換句話說，其文化程序大致已有一個輪廓。例如舊石器時代晚期的 Son Vi 文化；新石器時代的和平文化（還有爭議，有學者認為是舊石器時代，有的則認為是中石器時代，也有的認為是新石器時代）、北山文化、Da But 文化、Quynh Van 文化、Cai Beo 遺址（特殊遺址，尚不能自成一個考古學文化）、Ha Long 文化、Bau Tro 文化；青銅器時代位於紅河流域的 Phung Nguyen 文化、Dong Dau 文化、和 Go Mun 文化、以及位於馬江流域的 Hoc Loc 文化、和 Con Chan Tien 遺址等；以及鐵器時代的東山文化等。但是，文化發展過程的細節，以及造成文化變遷的原因、或動力，卻仍不甚明白。同時間橫向的文化互動關係，以及不同時間縱向的文化傳承關係，也都有待澄清。

就考古學資料而言，很明顯的，越南北部沿海地區考古學的研究課題，主要有舊石器時代晚期的 Son Vi 文化的內涵、新石器早期和平文化的起源和屬性問題、及其與鄰近地區史前文化間的相互關係、農業起源的問題、南島語族起源的問題、青銅文化的發展問題、複雜社會或文明起源的問題、以及文化互動的問題等。可惜的是，這些研究課題的性質，多半屬於個別地區內非整合型的研究。因為學術環境的封閉，不同區域間物質文化的比較研究，並沒有條件進行，國際學術的對話也幾乎不可能實現。

由於，越南北部地區在和平文化之後，新石器時代的史前文化，即呈現了地區性的發展。雖然在時間的傳承上有連續性，但是各考古學文化在空間的分佈上，卻呈現不連續的現象。造成這種區域性不連貫性的原因為何？是否是田野調查太少？是否是遺址已遭擾亂、破壞？或是另有其他的原因？以現有的考古學資料，並無法清楚的解釋其中的原因。雖然，這是一個為期一年的研究計畫，但本人卻希望能在往後的數年期間，持續在越南北部地區從事 post-Hoabinhian 文化的考古學研究。期望能從其發展的過程中，瞭解史前族群如何從早期從事初期農作的和平文化；如何演變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從事於穀類作物，具地方性色彩的地區性文化；又如何演變到青銅器時代，此時區域性文化發展已經成熟；最後，又是如何演變到鐵器時代，此時此地區似乎又復歸於「一統」。

其間的相關研究課題很多，因為時間、以及個人學養、訓練都有限，並無法全部掌握。只能先從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考古學文化作為切入點，先進行 Da But 文化的研究，例如：瞭解其文化傳承關係、探討其與其他地區性文化的互動關係、以及其本身的聚落分佈型態、生業適應方式等。然後，再向前或向後推展研究的範圍。

由於，越南北部沿海地區，不同史前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密切，例如：越南北部的 Da But 文化和大陸廣西地區的頂獅山文化，雖然分別被命名為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但是，它們的地理分佈位置都處於熱帶到亞熱帶地區，這使得它們在生業資源的取得、和氣候狀況的條件下，具有大致類似的發展基礎。它們之間亦有相似的生態適應，遺址所在位置多為河岸階地。它們都藉漁獵、採集的手段，廣泛的利用水生資源、和陸地資源。它們的分佈年代大致上相當，屬於同時性的存在實體。更者，在考古學物質遺留和埋葬習俗上，它們也都具有類似的文化特質。例如：編織紋都是陶器上的主要修飾紋飾、骨角器豐富、採行蹲肢屈肢葬等。因此，本計畫將針對屬於越南考古學文化程序的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考古學文化，以互動圈模式來解釋此一地區內文化間泛地區性的互動現象，以及其本身文化發展過程與變遷的主要動力。

「清代中國救助東南亞國家難船的方法」

研究計畫簡介

湯熙勇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壹、海難問題與救助資料的收集

二年前，個人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專題研究計畫—「清代台灣外籍船難的處理方法及其影響」時，因為涉獵數量眾多的海難資料，包括日本、朝鮮、琉球、越南（安南）及歐美等國家的船隻，在海上遇難後，飄到台灣及中國沿海地區，以及中國船隻飄到琉球、日本、朝鮮等地，興起了廣泛地收集及整理有關海難資料的念頭。

任職於日本關西大學的松浦章教授，在明清時代東亞海運史及海難史的研究上，為一著名的日籍學者，曾經發表相關的論著或介紹性的文章不下數十餘篇，因而邀請松浦教授及本所同仁劉序楓教授參與，共同推動海難資料的收集工作。

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支持下，個人與松浦章教授等共同向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申請補助。最初的構想，希望分年和分期來收集台灣、中國大陸、琉球、日本、朝鮮等地的海難史資料，並進行相關的研究工作。在經費有限的前提下，只能以台灣地區圖書館所收之海難史資料，及坊間已經出版之相關資料為基礎，先行整理，編成資料集二十二冊，及總目錄一冊，共二十三冊。去（2000）年，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之「第八屆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中，個人運用這些資料發表〈清順治至乾隆時期中國救助

朝鮮海難船及漂流民的方法〉論文乙篇。

貳、研究目標與重點

海難救助的意義，有人道內涵，亦不乏政治及外交的目的，透過救助難船政策及方法之研究，可以提供我們一個不同的角度，檢視在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中，東南亞地區與國家和中國關係之轉變。

一、本研究計畫之目標，旨在瞭解十七至十九世紀時，中國救助越南、暹羅、呂宋等東南亞國家之漂流船和船上人員的政策變遷及其實際實施之問題，包括救助之方法、撫卹內容及遣返措施等。因此，本研究計畫的內容，不僅注重海難救助的政策面，也關心海難救助的執行面。

二、在研究重點上：

1. 分析中國救助東南亞地區及國家之難船的政策及其意義，包括所謂「懷柔遠人」的內涵；
2. 衡估中國救助東南亞漂流民措施之實施與調整，包括漂流民的調查、生活費支助、遣返等；
3. 比較中國救助東南亞國籍漂流民之措施，與中國救助朝鮮、日本、琉球等國漂流民之方法的異同，也比較中國人民漂到東南亞國家所受的待遇；
4. 探討中國的海難救助政策對東南亞國家的海難救助之影響，如東南亞國家護送朝鮮、琉球等國漂流民至中國後，再由中國政府分別予以遣返之相關事宜。

參、以中國救助越南海難船為例

越南北邊與中國廣東、廣西、雲南交界，東邊則以東京灣及南中國海與中國相隔。兩國所屬之船隻，包括商船、漁船及公務船等，漂到兩國各自所轄之海域的消息，自清代以前，即時有所聞，例如清代台灣澎湖人蔡廷蘭，從廈門返回澎湖的航行途中，不幸遭風，漂流到越南，即為一個著名的例子。有關中國與越南之關係探討，在目前已出版之相關的研究中，以兩國之藩貢體制、中法越南戰爭及外交關係的演變，及越南的華僑為主，對於海難救助之問題，並無專文分析。

個人曾撰文探討中國所實施之海難救助方法，其中雖有涉及越南船隻漂到臺灣之事件，但非以中越間之海難救助為主。

清政府對越南漂流民的遣返方法，若其船隻可以修復，則予修理後，以原船遣送；若船隻無法修復，則以陸路遣返。此一遣返方法之實施，於 1718 年康熙朝即已實施。陸路之路線，以廣西為集中地，再送到鎮南關交給越南官府。若是經中國以外之國家所救，亦先送到廣東，再經廣西遣回。如 1815 年（嘉慶 20 年）4 月，越南嘉定城兵丁范維納等人，以換班之需，搭乘舢板船，不幸遇風，致使船隻毀壞，而被經過該海面之日本官員所搭乘的船隻所救，帶回日本，經由在日本之中國籍銅商帶到浙江乍浦，轉送到廣東後，再送到廣西蒼梧縣，於 1817 年（嘉慶 22 年）10 月，經鎮南關回到越南。從失事日算起，至返回越南止，前後歷時 2 年 6 個月之久。

1796 年（嘉慶元年）5 月，安南送回漂到彼地之中國官兵，依照 1791 年（乾隆 56 年），緬甸國對赴該國貿易之福建人蔡元媽、方賢二人，提供路費，並送到中國邊境後，由清廷賞給送返者緞錦紗疋等物品之法，以示賞賜與感謝之意。

中國船漂到越南，越南官府視為一種貿易的機會，藉著護送中國難船回返時，在護送船中，帶有所謂「壓艙貨物」，藉此機會在廣東出售，類似此種舉措之例子，不勝枚舉。1818 年（嘉慶 23 年），廣東水師船漂到越南，越南官府將難船上的人員及砲械等，分二批送回中國。在二次護送船中，皆帶有貨物進入中國。1829 年（道光 9 年），藉著護送遭難之監生回返廣東，夾帶貨物到中國；又如 1833 年（道光 13 年），護送廣東水師遇難人員回返中國時，兩艘越南護送船內帶有貨物。越南官員要求將所帶貨物出售之理由，乃是「藉作路費」，如果清政府要其納稅亦可以。中國官府對越南船所載貨物之處理方法，採取開放的態度，即「先行開艙起貨銷售，俾免稽遲」，再奏請清廷將其攜帶之貨物予以免稅。同時，護送船回返越南時亦購置及裝載中國貨物，所購置之貨物，亦一同免稅。

此外，清朝政府在處理越南海難船時，避免介入越南內部的政爭，採取關心而不干涉的立場等相關問題，值得深入的分析。

肆、參考文獻

十八、十九世紀時期，發生在中國沿海地區的海難資料，包括船隻的處理及船上人員調查、生活照顧及遣返等，以往散見於不同的史料匯編或單一的資料集成之中。在上述之《近世環中國海的海難資料集成：以中國、日本、朝鮮、琉球為中心》中，收錄有《內閣大庫檔案》、《明清史料》、《宮中檔雍正朝奏摺》、《雍

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等，這些資料，對有關東南亞國家船隻漂到中國（包括臺灣）沿海地區，以及中國及臺灣之船隻漂到東南亞國家的研究，具有直接的助益。此外，在《明實錄》、《清實錄》及《大南實錄》等史料中，亦收有東南亞的海難資料，將是本研究計畫參考的主要資料。

「法國殖民時期的中越關係」

研究計畫簡介

許文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長期以來，中越外交關係的研究焦點集中在 1883 年至 1885 年這段期間，討論的事件以中法越南戰爭與中法天津條約的簽訂為主。亦即中越關係的研究領域，在過去的研究取徑是以中法外交關係為主體。事實上，如果以歷史的連續性來考察此段中越關係的演變，可知中法越南戰爭的發生是一連串中--法--越三國之間外交關係演變的結果。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亦可說是東方的中華世界宗藩秩序觀與西方的殖民帝國主義國際法觀衝突的產物。安南阮朝嘉隆帝於 1802 年統一全越，由於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曾獲得法國之助，成為法國勢力進入越南之先機。初期法國志在傳教，商貿力量尚不發達，與阮朝猶可保持相安無事，繼任之明命帝開始反教，法越之間衝突漸起。及至 1859 年，法國佔領南圻以後，中、法、越三方關係遂產生變化。1873 年，法軍復入河內，次年法越兩方簽訂西貢合約，但此約實際上卻加深了中法越衝突的可能性。越方此後積極發展與鄰國的外交關係以示獨立，並派遣如清使節冀望中國支援；法國則亟以吞併越南作為進入中國西南傳教、貿易的基地；清廷方面則否認前述法越 1874 年甲戌條約的合法性，終於爆發中法戰事。1883 年，法越兩方簽訂順化條約，越南成為法國的保護國，中法兩國為此進入長達兩年的和戰局面，終於在 1885 年簽署中法和約，越南成為法國保護國及殖民地。往後數年，越南境內各地雖有抗法之舉，但終為法軍所剿平。

法國殖民時期的中越關係，是法國積極經營進入中國西南的時期，也是法國帝國主義在印支半島及中國開展的時期。中越之間的關係也都以法國帝國主義的影響為主。比較重要的問題有：一、廣西、雲南接壤界務；二、中越開通口岸訂

立商約；三、邊界對汛剿匪；四、孫中山在越南進行的革命活動；五、滇越鐵路的修築；六、越南革命運動與中國的關係。本計畫即以此段時期的各重大事件為主，對法國帝國主義下的中越關係作一全面性的綜合研究。

以往學者的研究主要參考中國史料，視野也主要從中國史出發，較少以外交關係的演變：即中越、中法、法越關係的互動作為研究重心。本計畫希望透過越南及法國方面史料，對於東西兩方不同的國際觀所引起的觀念衝突進行探討，以期藉著研究角度的不同，而能提出新的觀點。藉由以往外交史的連續性和斷裂性進行考察，可以發現近代東方國家在強勢的壓力下逐步接受西方國際法的過程，也可以解釋 1885 年中法越南條約以後，中國陸續和法國簽訂中越界約、商務章程，乃至民國時期所簽訂之多項與越南相關條款的原由。

「集團經濟與東南亞新秩序—1930 年代上海、香港、新加坡之間商貿網絡的變化」

研究計畫簡介

李宇平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二十世紀初，歐美商品在東亞漸有廣大的銷售量，刺激了若干原以集散地區性的東方商品（特別是中國產品）為主的貿易中心，如東京、上海、香港、新加坡的繁榮與成長。這些城市由於漸漸與世界貿易網絡連結，從而發展成為遠東的貿易中心。1930 年代以後，日本為了擺脫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衝擊，將經濟由蕭條困頓中解救出來，開始積極策劃集團經濟，企圖由「日滿華經濟圈」（Japan-Manchu-China Bloc）步步走向「大東亞共榮圈」（Great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日本極力提升產業競爭力，並以增加資本輸出，產品輸出雙管齊下的方式，大力向中國與東亞推進，使日本商品在該等地方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從而大幅搶走了歐美舶來品及中國國貨的原有市場。由於東亞做為一個日本商品的消費市場，與日本的生產地相距不遠，加以大阪、神戶此類日本對外貿易通商的港口，可以直接以二、三千噸的輪船為運輸工具，即將貨物廉價運至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各地，而未必須透過上述的遠東商埠發揮其中介市場的轉運功能。所以隨著日本商品對外銷售數量的急遽增加，以及日本商價格品相對於中國及歐美商品的極其低廉，亞洲內部商品網絡與銷售市場開始因商品種類的不同而產生區隔。東京，以及原本在東亞貿易上不甚耀眼的台北（時在日人統治之下）、雅加達，因運送日本商品而形成一個商貿路線，且此一商貿路線有愈趨發達之勢。相對而言，原先具有集散歐美及中國商品之功能因而連結成同一貿易路線的上海、香港、新加坡，其所扮演之遠東國際中心的地位，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兩條商貿路線的興衰消長，以及遠東經濟中心地位的變動，可以說明東亞

何以在日本經濟走向繁榮後反而持續發生了經濟恐慌的現象。此一遠東經濟局勢的變動，同時也說明了原先在東亞居於霸權地位的英美，與新興的日本等經濟勢力，在東亞所發生激烈經濟競爭之一斑。本計畫擬由上海、香港、新加坡此一商貿路線與網絡的興衰消長，觀察此一變化所反映的意義。

此一研究計畫所具有之歷史意義，可分三點說明：

一、集團經濟與亞洲國際經濟秩序的研究展望：

自 1930 年代英、法、德諸國分別形成集團經濟圈後，各集團經濟圈即因爭奪資源而引起激烈的對抗，遠東的日本也受到致命的打擊。基於維持國際競爭力的考量，日本開始謀畫自身獨自的集團經濟。自此，亞洲的國際經濟秩序丕變，保守的經濟國家主義重新抬頭，並漸漸戰勝了一次戰後的國際經濟協調主義。以中國為核心的東南亞國際經濟秩序和產業活動不免受到深遠的影響，本計畫擬議動機之一即是希望瞭解集團經濟與亞洲新秩序形成的關係，並觀察其對中國與東南亞的影響。

二、近代亞洲交易圈的研究展望：

由於人們普遍預測二十一世紀亞洲將成為新的世界經濟中心，亞洲經濟圈成了諸經濟圈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在對亞洲經濟圈的歷史演變進行反思的過程中，學界開始認識到，過去在西力東漸巨大的陰影籠罩下，對亞洲內部歷史悠久之以市場網路為基礎的經濟關係，有所忽視和曲解。因而開始重新檢討亞洲經濟圈在長時段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演變、自主性和運行特點。本人希望就 1930 年代東亞商貿網絡的變動，觀察此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淵源與特徵。

三、1930 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的研究展望：

1930 年代世界發生的經濟大恐慌乃歷史上持續最久，規模最大的經濟恐慌。迄今學者的研究焦點多半集中在歐美工業國家所受的衝擊。然而大蕭條迄今的影響是世界的，工業恐慌與農業恐慌同時發生，交互影響，這是大蕭條所以極其嚴重的原因。除若干核心工業國家之外，若干農業國家亦曾遭受嚴重的波及，所以學者對大蕭條的研究自不應以核心的工業國家為限。有關 1930 年代東亞商貿網絡的研究，即是從此一關懷出發，希望就已開發國家之外的非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大恐慌期間所受到的衝擊，做一觀察。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世界經濟大恐慌是如何從已開發國家擴散並發展至未開發國家的？據此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推斷 1930 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規模到底有多大？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到底有多深？

「日本帝國內外地行政一元化下的印尼 (1944-1945)：以爪哇奉公會為比較研究」 研究計畫簡介

蔡慧玉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本計畫旨在剖析戰時中印尼在日本「內外地行政一元化」(1942)運動的口號下所成立的「爪哇奉公會」(1944-1945)，分析日本軍政佔領下爪哇地域的地方行政，並與同時期日本在殖民地臺灣所成立的「皇民奉公會」比照分析，以期對日本殖民帝國地方行政的運作分析提出一個比較研究的基礎。以印尼為個案研究，正因為印尼是戰時日本在東南亞軍政區內的首要之地，因此臺灣、印尼與日本本土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格外重要。

在戰時中的爪哇地域，地方動員的「權力樞紐」在行政村以下究竟落在那個單位、組織或團體上？本人最近以「鄰組」為中心，發表一篇比較研究，¹文中指出：在臺灣，落在保甲；在印尼，為 desa（相當於日本的「村落」）；在日本，就是「大字」，也就是明治二十一年（1888）市町村制公佈（翌年實施）以前的舊町村。本計畫將在這個研究基礎上，進一步自「部落」所代表的歷史意涵切入，並以日本在 1942 年所提出的「內外地行政一元化」這個運動為中心，剖析印尼在日本軍政下所成立的「爪哇奉公會」(1944-1945)，以期與同時期日本在臺灣所展開的「皇民奉公會」(1941-1945) 對照。

¹ Caroline Hui-yu Ts'ai, "Examining Japan at war: Tonarigumi in Java, Taiwan, and Japan (1940-1945)," 16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IAHA),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Kota Kinabaru, Sabah, Malaysia, July 28, 2000.

就時間而言，本計畫的研究重點是印尼在日本軍政統治下（1942-1945）的後段時期（1944-1945），但涉及的問題不以戰時動員為限，因此在時限上溯及荷治時期，並觸及戰後印尼的政治以及社會的重組。

究竟戰時中印尼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如何動員？與佔領國的日本又如何互動？本計畫試圖從印尼這個地域出發，觀察日本「全體帝國」（total empire）在總體戰下政治社會結構的演化，以為日治臺灣（1895-1945）研究的參考基點。再者，「鄰組」和「部落」為本研究的兩個主要駕馭概念。「鄰組」（neighborhood）在理論架構上是一個有力的概念，可以用來解讀近代日本在國家肇建和帝國擴編上的雙重發展，而日本軍政下的爪哇研究便是一個理想的切入點。本計畫企圖從「部落」的角度出發，以「爪哇奉公會」為例，探討近代印尼在日本軍政下的基層行政，以試圖了解軍政下的印尼如何與日本互動，藉以重構日本的國家肇建如何導致帝國擴編，帝國擴編又如何反過來修正國家肇建的過程。

一九三〇年代開始以後，依後藤乾一的分期，²日本的「南進政策」進入第三波。戰後半世紀以來關於日本「南進政策」的研究絕大多數出於日本學者之手，而分析重心也不外以日本為樞紐，並以戰前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為範圍，因此臺灣研究也好，東南亞研究也好，現有的分析架構都不出以日本為中心的「同心圓」。一直到最近，美國學者楊露蕙提出「全體帝國」（total empire）的理論架構以後，³「中心」（core）和「邊緣」（periphery）的微妙互動才首次得到正視。即使如此，楊露蕙的研究係以日本人的滿洲移民機制為個案，其「全體」帝國的理論架構只說明了二元空間的互動關係，對於日軍佔領下東南亞的多元空間無法全面照顧。因此，本計畫在區域性研究上所提出的視野和切入點應該可以修正石田雄的「同心圓說」⁴以及楊露蕙「全體帝國」的理論架構，對於當前日本殖民帝國的研究應該會有所衝擊。

再者，東南亞這個多元空間在日本戰時的「南進政策」中還必須加入臺灣。臺灣對日本本土而言雖是「外地」，也就是「邊緣地域」，同時也不在官方定義下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中，但相對於東南亞諸國而言卻是「中心地域」。東南亞各地日本軍政下的行政和技術人員不少都由臺灣直接派遣，⁵而臺灣也在戰時勞務動員下提供「大東亞共榮圈」大批勞動力。此外，雖說「爪哇奉公會」（成立

² 後藤乾一，〈臺灣と南洋：「南進」問題との関連で〉，收入大江志乃夫等（編），《（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2：帝國統治の構造》（東京：岩波書店），頁 147-175。

³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⁴ 石田雄，〈「同化」政策と創られた觀念としての「日本」（上）〉，《思想》（岩波書店）892（1998 年 10 月），頁 47-75；〈「同化」政策と創られた觀念としての「日本」（下）〉，《思想》（11 月）893，頁 141-174。

⁵ 鹽見俊二，1943。〈台灣統治方式とインドネシア統治方式：附南方統治へ臺灣の政治協力〉，《臺灣時報》〔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編輯，臺灣總督府內臺灣時報發行所發行〕26 卷 11 號（通卷第 287 號）（11 月），頁 1-14。

在 1944 年三月)的「五族協力」體制，論旨趣係源自日本佔領下滿洲的協和會，但論組織其實是以臺灣的「皇民奉公會」——而非日本的「大政翼贊會」為藍圖。

在比較研究方面，本計畫試圖從印尼這個地域出發，以同時期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為參考基點，觀察日本殖民帝國在總體戰下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演化。這個參考基點其實又建立在另一個前提或假設上，那就是：「鄰組」和「部落」兩個概念分別代表印尼在日本佔領下的「本土（日本軍政）化」和「土著（印尼建國）化」。在「爪哇奉公會」成立之前，日本軍政已在印尼地域展開「三 A 運動」（1942）⁶和包含地方行政官在內的 Putera（住民總力結集運動，1943/3-1944/2），並成立爪哇青年團和警防團（1943/4）、鄉土防衛義勇軍（PETA，1943/10）；「爪哇奉公會」成立之後設立的組織則有爪哇民眾運動行動隊的「奉公推行隊」（Barisan Pelopor，成立於 1944/11）、回教運動行動隊的回教青年挺身隊（Hizbullah，1945）等。因此，「爪哇奉公會」是戰時印尼動員體系中的一個樞紐帶，而印尼的動員組織則有走向群眾的傾向。

日本軍政在印尼這三年半時間所成立的這一系列運動和組織，對印尼這個地域而言究竟意味著「本土（日本軍政）化」或「土著（印尼建國）化」的傾向？這個歷史論辯耐人尋味，是為本計畫提出的動機，也是本人近年來試圖分析詮釋的問題意識之一。

檢視日本殖民帝國的「遺產」，不難得知戰前日本的帝國締建對於戰後亞洲秩序的衝擊和影響之一，乃是戰後亞洲威權體制的建立和潛在性的革命取向。現代化也好、民族主義也罷，這個日本殖民帝國的「遺產」都指向政治、記憶和歷史的互動和形塑；換言之，日本軍政的遺緒之一就是戰後這半世紀來亞洲各地民族國家的締建運動——當然也包括戰後印尼的建國運動。探討總體戰下日本總動員的歷史意義必須能掌握到這一點。因此，本計畫雖然屬於歷史性的研究，但對於今日亞太地區秩序的建構也具有當代意義。

⁶ 該運動的口號為：「日本為亞洲之光」、「日本為亞洲的守護者」、「日本為亞洲的領導者」。詳閱 Satō Shigeru, *War, Nationalism and Peasants: Java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 (Armonk, New York & London, England: M. E. Sharpe, 1994); “Japanese Occupation,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Asia,” in Loyd E. Lee, ed., *World War II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the War's Aftermath, with General Themes: A Handbook of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8), pp. 121-137.

「麻六甲都市的文化多重性與其歷史的形成過程」研究計畫簡介

黃蘭翔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壹、計畫概要

一、初始的問題意識

我曾在今年 7 月底利用前往沙巴，參加第 16 屆亞洲歷史學會，順道試訪了麻六甲、檳城等都市，作了初步的觀察。從這幾個重要的東南亞華人歷史城市中，讓我聯想起臺灣普遍存在的鹿港、三峽、迪化街、湖口老街等等的市鎮與店屋建築。包括臺灣的傳統老市鎮在內，這些華人城市的形成時間、華人移民的祖籍背景都有相當的類似性。雖然這次的參訪只作初略的觀察，但我也可以發現上述這些東南亞都市屬於多民族「雜居」的都市，非但華人住在店屋裡，即使馬來人、印度人，或是伊斯蘭教徒也都住進具有強烈華人文化影子的店屋之中。所以店屋非但是成熟的「都市類型」之住宅，也說明了店屋住宅不只是華人的居家生活形式，也是華人與其它族群的共有的生活經驗。另外，我也明顯發現這些都市中的華人會館在華人的生活裡仍佔有重要的角色，而這些會館、家祠的建築形式都與臺灣或是閩粵地區有極類似的建築型態（仔細分析之後，當然會發現其融合東南亞文化的性格），所以以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海南島地區，以及臺灣、東南亞華人市鎮為調查田野，從事華人集居的都市住宅（店屋）之調查與研究，想必是未來臺灣建築史、文化史學界的重要課題之一。

二、研究的課題

回台之後逐漸閱讀相關文獻之後，也才逐漸瞭解麻六甲都市史、建築史的研究意義，遠遠超過只關心華人的議題之上。從下面所附錄的麻六甲發展簡史，也可以瞭解麻六甲的「主流」的「大歷史變遷」。

麻六甲在 13 世紀以後到 1511 年被葡萄牙佔領，興建為商館城塞據點以前為止，是伊斯蘭教文化的中心地。1511 年以後因應全世界大航海時期的到來，麻六甲成為西歐殖民宗主國，從事貿易與傳教的軍事根據地。後來的英國的崛起與華人 19 世紀末勞工的出現，使得麻六甲演變成今天可以看到的麻六甲之風貌。這種多種文化隨著歷史的推移，一重又一重的累積下來，不因為時代的不同，前時期的建築都市遺跡或是文化信仰就流失掉。如何就麻六甲所處的東南亞之歷史、地理、文化、種族等等的位置，解析麻六甲都市與建築及不同種族文化之間的混合機制，是東南亞研究之中重要的課題，也是本文首先有興趣的命題。

反過頭來，回顧臺灣的歷史發展過程，有深層的原住民文化，亦有自荷鄭航海時期以來源源不斷進來的西方文化，亦有福建、廣東華僑原鄉的「閩粵文化」，還有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前半，因受日本的殖民統治，日本有意識的植根日本文化於臺灣，甚至想要「同化」臺灣。在這種歷史發展的背景下，使得臺灣的建築與都市呈現多重文化的面向。進一步思索荷西時期的西方文化或是閩粵文化，其實與東南亞的歷史文化又有一脈相連的關係。所以對麻六甲與臺灣之研究並非可完全獨立分開來處理的，如何發展臺灣與麻六甲建築史、都市史研究「異同」的課題是本研究第二命題。

還有，從整個東南亞的馬來文化而言，13 世紀以前，伊斯蘭教文化的阿拉伯商人未掌控東南亞東西貿易網絡之前，有本土的馬來文化，也深受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之影響。然有關麻六甲，一般的論述材料並沒有顯示如其它東南亞地區受南傳佛教與印度教文化之影響，但是就在他的近旁的緬甸、泰國、柬埔寨、占婆、爪哇等地都有巨大而雄偉的印度教・佛教遺跡之下，為什麼蘇門答刺與馬來半島沒有深受印度教・佛教的影響，這反而是有趣的逆命題。

貳、麻六甲發展簡史

因為方便進一步論述麻六甲的研究課題，在此願意藉中原道子的文章為中心，回顧一下麻六甲的發展簡史。

一、麻六甲王國的建立

從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作初步的檢索知道，有關滿刺加（後來改稱「麻六甲」）最早出現在中國漢籍《明史》上。也知道創建麻六甲王國的是自 Palembang 出身的拜里米蘇刺(Paramaswara)。他利用了當時中國明朝的永樂帝想積極拓展外交的企圖，以及名永樂帝的強大勢力為背景，實踐了麻六甲建國的夢想。這是麻六甲王國之所以能在北邊有泰國的 Ayutthaya 王國，南邊爪哇有 Majapahit 王國兩強夾縫中誕生，而且還能殘存下來的原因。

永樂 3(1405)年，拜里米蘇刺隨著永樂皇帝派出來的使節中官（太監）尹慶回國之際，也向明朝派送了使節團，明的皇帝也就加封了拜里米蘇刺為國王。拜里米蘇刺國王在位期間，共送出 5 次使節到中國。1411 年，國王自身率領妻子、家臣共 540 餘人往訪明朝，在南京駐留了 2 個月。麻六甲王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維持到 1511 年被葡萄牙人佔領為止，以貿易轉運中心繁榮了 100 年之久。¹

基於伊斯蘭商人掌控東西海上貿易及伊斯蘭文化本身所具的魅力，麻六甲的統治者接受了伊斯蘭教文化。後來麻六甲的宮廷亦成了東南亞伊斯蘭馬來文化的中心據點。有關麻六甲人信仰伊斯蘭教的事實，亦可以在馬歡《瀛涯勝覽》的「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記載得到證實。馬歡本身是伊斯蘭教徒，他的觀察自有其可信度。這本書是在他初次航海（1413-1415）之後所著述的，可知麻六甲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改信伊斯蘭教了。麻六甲的王侯貴族們生活於這樣的轉口貿易所帶來的繁華之中，維持以宮廷為中心的馬來王權，因而創造其本身文化的傳統。²

二、西方殖民國家的到來

絕大部分的國家經濟基礎都依賴外國人的麻六甲王國，面對 16 世紀開始的歐洲殖民國家的武力攻擊，就顯得十分脆弱。葡萄牙早先為確保其貿易活動，所以進行武力驅逐那獨佔東西方海上貿易的伊斯蘭教勢力，麻六甲王國也因而面臨滅亡的命運。

葡萄牙佔領麻六甲的 1511 年以後，麻六甲成為有堅固城牆、大砲、天主堂的港口都市。於 1641 年葡萄牙人又遭荷蘭人的驅逐，麻六甲成為荷蘭人的基地，因而掌控了香料的貿易。雖然葡萄牙人留下了龐大的有關殖民地的記錄資料作為

¹ 中原道子，〈マラカ海峽〉，收錄於京都大學東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編《東南アジア——風土・生態・環境》，東京弘文堂，平成 9 年 3 月（1997），頁 344-345。

² 中原道子，〈マラカ海峽〉，頁 344-345。

遺產，但是過去那被讚為有如「裝飾在葡萄牙國王皇冠上的真珠」之麻六甲，當荷蘭人破城而入的時候，據說隨地可見到戰死的屍體，處可聞的因瘟疫病死或是餓死的屍臭味。³

1790 年代，英國開始對東印度群島上的荷蘭勢力產生威脅，歐洲一旦發生拿破崙戰爭，波及荷蘭的領有的麻六甲與爪哇曾經一段時期進入英國人之手。但是希望與荷蘭保持和平關係的英國，將其於 1816 年歸還與荷蘭，又於 24 年的倫敦協定，劃定以麻六甲海峽為界，馬來半島屬英國，東印度群島屬荷蘭的勢力範圍，將 Bengulu 與麻六甲的領有權相互交換。⁴

然而，英國人先前在 1807 年，卻決定將到手的麻六甲城牆拆毀。關於這段歷史，在後來成為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的書記官，也是語學教師的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的自傳《Abdullah 的故事》中，記載了英國人拆毀堅固的葡萄牙人城牆當天的事情。記載說要拆毀堅固的城牆實相當不容易，最後於城牆的位置放上炸藥爆破，其城牆被炸得粉碎，碎片散落一地，沈入海底。「城牆就是麻六甲的光輝。城牆被破壞後，麻六甲就失去其魅力，就好像失去丈夫的女人，她臉上的光彩就不見了」。⁵

麻六甲的城牆之拆毀，象徵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也就是從 16 世紀到 18 世紀期間，以擁有堅固城牆的港口都市為根據地，支配海上貿易的葡萄牙時代的結束，也是意味著馬來半島的英國近代殖民支配的開始。於荷蘭時期，因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據點遷至巴達維雅（今日的雅加達），麻六甲自此以後就如同時間停止的小城市，因英國殖民地的統治而甦醒，人口增加，恢復都市的活力。後來又因英國殖民地中心地移至新加坡，麻六甲自此就從華麗的世界歷史的舞台消失。但是記錄了歷史上的光榮與傷痕的麻六甲，如今也仍然被保存下來，成為深具魅力的歷史小鎮繼續存活著。⁶

三、轉化為華人城市

歐洲在 19 世紀中葉以後，以英國為首的西方殖民宗主國於東南亞推動的殖民政策，是基於在國際上從非洲的奴隸貿易所作的勞動力供給越來越困難，也要確保南、北美洲及非洲所需的勞動力之下所制訂的。因而提供了印度、中國的勞動力。進一步，為使在開發適合東南亞自然條件的農園時，確保其所需的勞動力，

³ 中原道子，〈マラカ海峽〉，頁 344-345。

⁴ 鈴木恆之，〈東インド會社〉，收錄於京都大學東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編《東南アジア——風土・生態・環境》，東京弘文堂，平成 9 年 3 月（1997），頁 307。

⁵ 中原道子，〈マラカ海峽〉，頁 344-345。

⁶ 中原道子，〈マラカ海峽〉，頁 344-345。

因而自印度、中國導入大量的勞動力。從 1870 年代以後，移民的方法從稱為苦力移民的奴隸貿易的性格，轉到以契約移民的方法。結果，東南亞社會就由相對上較為獨立的原住民為中心的地方社會為底層，上面重構了由印度移民、中國移民所形成的，具廣域範圍流動性的地域社會，其次是歐洲等的外部社會位於其上部，存在這種三層的地域關係。如在馬來西亞，英國的殖民地政府，採取政府-印僑-華僑-馬來人的移民政策（階級政策），使其在與現地的馬來系人之間，介入了印僑、華僑的資本或是勞動力。⁷麻六甲就是在這種大時代的背景之下，演變成今天我們可以直接看到的華人城市風貌。

⁷ 濱下武志，〈中國と東南アジア〉，收錄於石井米雄等編，《講座東南アジア學；第四卷 東南アジアの歴史》，東京：弘文堂，平成 3 年 4 月（1991），頁 112-144。

「日本、台韓與東南亞的產業發展與貿易依存關係的比較研究」研究計畫簡介

黃登興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我們指出 1980 年代以來東南亞產業發展特色有別於早年的四小龍(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NIEs)。1980 年代以來台韓的經濟發展到相當的程度後也開始進行對外投資，其於東南亞的投資項目，雖然大部分是屬於昔日承繼日本的勞力密集產業，然而也有相當程度的投資屬於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如電子資訊業等。愈是晚近的科技密集產業，其在國際間的垂直分工程度也愈形細密，因而產業內貿易的現象也越來越顯著。不同產業的國際投資，所帶動的貿易關連性理當有所不同，因此，前述兩個期間的日本、NIEs 與東協四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簡稱 ASEAN4）之間的貿易關連性也理當有所更迭。本研究將一方面透過理論模型的建構，檢討傳統文獻中衡量貿易關連性的缺失，提出更精密的衡量方法。另一方面應用詳細貿易資料（1960～1998）進行模擬分析，以解析 1970 年代初以來日本—NIEs 之間的貿易關連性，比較其與近十幾年來 NIEs、ASEAN4、日本兩兩之間的貿易關連性的差異。我們將從幾個面向來觀察：除了一般的貿易結構如出口比重、進口比重外，我們將計算產業內貿易、各國區域（NIEs、ASEAN4、日本）之間的貿易密集度（不同產業的出口、進口密集度）來反映其依存關係；必要時將與同期的歐盟或北美來進行比較。

「國際貿易新秩序下臺灣與東南亞的農產經貿 關係」研究計畫簡介

張靜貞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1994 年在印尼茂物(Bogor)所舉行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領袖會議，APEC 領袖們設下實現自由貿易和投資(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的時程與目標，對於已開發之經濟體為公元 2010 年；至於開發中經濟體則為公元 2020 年。此一自由化目標亦於 1995 年大阪會議中所發佈之 APEC 一般性原則中被確認，基於廣泛性原則，農漁業和糧食將被包括在此一自由化時程之中。1998 年 6 月 APEC 經貿部長會議於馬來西亞古晉(Kuching)舉行，會中討論了備受 APEC 各經濟體爭議的「提前自願性部門別自由化」或稱「自願性提前自由化部門」(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 EVSL)套案。APEC 提出了所謂的第一波提前自由化部門項目清單(A Plus List)，即漁產品、林產品、能源及其設備、化學及其製品、寶石及貴金屬、醫療器材與設備、玩具、環保設備及服務、和通訊等九項部門，擬定於 1999 年開始實施。此外，第二波的六項清單(A List)中則包括汽車、航空器、食品、油籽、肥料及天然橡膠，預期其爭議性與其對臺灣農漁業之衝擊，將會更為廣泛且深遠。此次 APEC 與會經貿部長同意採取「彈性」原則將包括漁產品等九項部門以「貿易套案方式(Trade Pack)」全面列入「提前部門別自由化」清單內，雖然保有部門別自由化可作彈性的處理原則，但零關稅時程幾乎已被設定。

EVSL 是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第一波，有 3 項主要的特色：(1)係基於自願性之原則；(2)九項提前部門別自由化清單必須採「全面加入」的「套案(Package)」來處理；換言之，缺一項不可；及(3)九項提前部門別自由化清單，最遲在公元 2005 年，關稅稅率必須調降至零，即屆時漁產品進口為零關稅。此提前部門別

自由化套案亦成為世界關貿總協(WTO)即將展開之千禧年回合談判的重要討論議題之一，並在美加等國之推動下，已在準備會議中正式提出要將此套案納入下一回合自由化談判項目中。

在前一年度的「東協自由貿易區域組織對我國農產貿易之影響」計畫中，我們曾以區域經濟整合趨勢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域組織為主題，來嘗試瞭解東南亞國協之形成與發展，並採用經濟學中關稅同盟的理論，來探討東協形成之後，農產品關稅之降低對區域內與區域外各會產生什麼影響效果，以及對台灣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農產貿易關係將帶來何種結構性的改變。依據初步之分析得知，我國與東協在農產品出口比較利益方面來看，只有畜產類和漁產類的競爭力尚領先東協。另外從本文結論中得知，東協各國之中，除了新加坡外，其他各國均擁有豐富的自然與人力資源，原本即是適合發展農業的國家，再加上近來該地國民所得與人民消費水準的提升，使得對食品的需求日益多樣化。因此未來不論從比較利益或是市場潛力的觀點來看，我國若能透過跨國性的投資或是合作開發的方式，進一步與東協建立起在農產品與農工原料產銷上的垂直分工或水平統合的關係，必對我國與東協之間未來經貿關係的提昇大有幫助。

有鑒於農業在東南亞國家經濟命脈中佔有重要地位，近十年來我國與東南亞農產品之貿易與投資成長迅速，因應世界貿易自由化之潮流及 EVSL 即將實施之際，此種自由化調整幅度對我國農業部門與相關食品及農產加工產業之影響將頗為深遠，也將影響到我國以及東南亞之間的貿易型態與發展，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將分析我國與東南亞國家農業之經貿發展關係的過去與未來，並評估部門別自由化套案或類似之自由化提案實施後對我國以及東南亞之間的經貿關係所帶來之影響。

今年度本計畫之預計工作項目包括以下：

一、搜集 APEC 組織之相關資料文獻，並分析此區域自由貿易組織之未來發展趨勢。

二、搜集文獻及統計資料來分析東南亞各國過去農業及農產加工產業發展之特色及主要貿易結構。

三、搜集台灣與東南亞各國農業及農產加工產業貿易之基本資料。

四、利用世界貿易流量資料來探討 APEC 之發展對我國與東南亞農業及農產加工產業之貿易會產生何種影響，是否產生區域性之替代現象等。

「融合或衝突？馬華伊斯蘭近代發展初探」

研究計畫簡介

朱涇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I. Motivation

The project was started in July 1999. The present program is to request for an extension of 12 months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study and to include one more researcher specialized in the field of demography, firstly to work on a few yet untouched points of focus presented in the first proposal, and secondly, to compile all data, and produce a comprehensive and well framed work as a final result. It follows the steps of the first year that aims to uncover the contact from both sociology and history.

1.Sociological approach

Every year, in Malaysia, there are many Chinese who embrace Islam. The figure varies from year to year, but it may range from a few hundreds to sometimes more than a thousand. Even though Islam is the official religion, and there exists an Islamic propaganda movement to some of the local tribes, the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freedom of religion to all citizens, and there is no forceful Islamization policy. Malays are Muslim by constitutional definition. What makes some of the Chinese to

convert to Islam, their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e difficulties they face and their ethnic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alays and other Chinese have been subject matter to the few writings presented within the year 2000.

2. Historical approach

The study this year also looks into the historical role that the Hui Chinese may have played in having some Chinese in Malaysia wishing to come into Islam. Are there any decisive changes or turning points occur in the history of intercommunications in between countries? It focuses on two eminent Chinese sejourning to Malaysia from China:

(1)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when Zheng He (鄭和, who was Muslim) first set foot on Malayan soil in the early 1400s, did some of his Muslim retinue stayed and propagated?

(2) In the early 1940s, an official Chinese Muslim delegation led by Hj. Ibrahim T.Y. Ma (馬天英) visited several states in Malaysia and was warmly welcomed both by the Malays and local Chinese. Was this an early start to a certain affinity towards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Muslims?

Over the years, there has been an obvious change in the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the reasons for conversion, the status enjoyed, an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Chinese Muslim in Malaysia. This would be an interesting area to explore in line of this study, and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ny other reason than only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that triggered the change.

The global Islamic resurgenc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has affected Malay Muslims in a big way. What reaction does it engender in the Chinese Muslim community in Malaysia? Are they directed to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 religion than the past generation?

As the Malaysian Chinese Muslim encounters more Muslim Chinese from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does he perceive himself in a different identity than the converts from the early Independence years, when they had to quickly assimilate into the Malay way of life? Or are they starting to shape for themselves a new identity within the multicultural Malaysian society?

A comparison of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Muslim Chinese with other Chinese may be another dimension to explore when discussing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 and the role they will play in the future,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Malays and Chinese.

II. Purpose of the study

As part of a wider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and specifically Chinese of the Muslim faith, or Chinese Muslims as an entity,

1.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a religious as well as political leader from modern China to Malaysia;
2.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f a religious as well as political leader from Ming China to South China Sea;
3. Scientific discoveries: to find out and clarify facts about Muslim Chinese as a specific group in Malaysia, identify their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4. Fact finding: to find out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among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5. Problem solving: to assess and hopefully raise some suggestions to assist the acceptance and integration of Muslim Chinese in the Malaysian society
6. Evalua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and among cultures.

III. Focus and main points of the study

The report of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 will include the following items:

1. Introduction and book reviews
2. The Hui Chinese settlers in Malaysia with two case studies as models and examples.
3. The proselytizing movements an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4. The process of Chinese embracing Islam (conversion through marriage, adoption, government policy or Islamic propaganda movement).
5.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uslim Chinese in Malaysia (size, conversion, and distribution)
6.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Chinese converts, their ethnic relations with the Malay Muslims and the other Chinese.
7. Their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years in line with the socio-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country.
8. The Islamic resurgence movement in Malaysi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Muslims.
9. Comparison of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Muslim Chinese with other Chinese in Malaysia (education / literacy, occupation / employment / income, health status and welfare) their significance between & among cultures.
10. The future prospect of the Muslim Chinese in Malaysia (acceptance and integration, political status and role).

Reports of the above ten items will be written by the four researchers, each of them taking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write certain items.

IV.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will be a mainly qualitative study with some quantitative parts in the form of both simpl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as well as some statistics on the existing sources from those literature on Islam, and registries, records and files in various Islamic organizations in Malaysia.

Methods used to complete the research will strive to b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will include:

1. Literary reviews on previous related studies.
2.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relevant documents and books from various sources, such as the National Archives, Islamic Centre, University libraries, private libraries,

etc...in both Taiwan and Malaysia.

3. Study of records and files from various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in West and East Malaysia and that of Muslim Associations i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China.

4. Simpl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determine how the Malay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view Chinese Muslims in their midst, and what do they think of their future role in Malaysia. For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and analysis of the result.

5. Extensive in-depth interviews. A partial list of potential interviewees is as follows:

(1) Historians:

*Prof. Ding Chung-Miu (residing at Taipei)

*Prof. Khoo Kay Kim (temporarily residing in Singapore)

*Prof. Naquib-Al-Attas, President of Ishtaq (Post Graduate 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

(2) Hui Chinese missionary workers who have worked or are still working with Malaysian and South-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 'dakwah' organisations:

*Iman Ma Hsiao-Qi (Taipei Grand Mosque)

*Hai Wei-Liang (now residing at Taipei)

*Adam Zhao GuoZhi (now residing in the U.S.A.)

*Dr. Mohammad Ali Wang ErLi (now residing in Australia, former Deputy Chairman of REISAP)

*Puan Sri Minuira Sabki Ma Min (Chairman, PERKIM, Women's wing)

*Datuk Mustapha Ma Chi (President, Malaysian Chinese Muslim Association (MACMA)) and others Prominent Malaysians who are attached to the same organisations

*Tan Sri Datuk Taib (now residing in Malaysia)

- (3) Officials of 'dakwah' organisations i.e. PERKIM, REISAP, Islamic Centre, MACMA (Malaysian Chinese Muslim Association)

A random cross sec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converts

A random cross section of non-Muslim Malaysian Chinese

A random cross section of Muslim Malays

6.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 term of size, 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 are to be studied retrospectively from the registries, records and files in the various Islamic organisations.

7. Apart from the historical Hui settlements in Malaysia, the other focal points of this study are all current and living questions; therefore the justification for the extensive interviews.

Preliminary data collection has been accomplished to certain degree and part of its analysis has already been done by the three researchers in the first one and a half years. Four articles in English and two in Chinese was draft and one of them has been published.¹

The focus of the second term will be placed mainly in Malaysia where Rosey Ma will first do the local field work and reinforced by Chu Hong-yuan the coordinator, C.K.Lam (residing in East Malaysia) and Cheng Yueh-li (in Taiwan), the associate researchers. That means they shall distribute the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in the field of both West and East Malaysia, as well as the qualitative findings from both Malaysia and Taiwan, among the four, and then the researchers will analyse separately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 of focus. Under the well framed sharing of workload, it is likely to form a book-like report at the end of the year 2001.

V. Sharing of Workload

Prof. Chu Hong-Yuan

1. Coordinator;

¹ 朱宏源、王樂麗、鄭月裡合著，〈融合或衝突？馬華伊斯蘭近代發展初探〉，《漢學研究通訊》，19:2，民 89 年 5 月，頁 219-235。

2. Research bibliography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aiwan: index and categories of material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3. Resources creation: Some interviews will be carried out in the language of the interviewees and personal collections will likely be collected for research.

4.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nding through group discussion and an international seminar.

5. Organizer of an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subject in November 2001.

Rosey Ma

1. Research material in English and Malay;

2. Data collection;

3. Interviews;

4. For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see appendix);

5. Transcript in English.

Cheng Yueh-Li

1. Research in Taiwa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in Chinese;

2. Interview with Prof. Chu the interviewees who take the position for or against Muslim in both Malaysia and Taiwan;

3. Bibliographical construction.

Dr. C. K. Lam

1. Research material in English, Chinese and Malay at East Malaysia; with focus on Kuching

2. Data collection from the archives of Sarawak Museum and libraries;

3. For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and sociological survey.

VI. Scholarly Significance

1. Bibliographical construction

The first one and a half years: bibliographical collections will form a preliminary basis for future research. They will be modified in the following year for future publication.

2. Data & resources creation and collection

Relevant materials will be systematically created and collected in both Taiwan and

Malaysia. They can be used as resource material by not only the researchers of this project but also the future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3. To construct or uncover stories and the inside story of some personnels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Islamic society

Chinese Muslims are today one distinct group within the Malaysian society. However, not many people (outside or even in Malaysia) are aware of their existence as a group which is not easily categorized under the traditional groupings of ethnicity or race.

4. Bet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nfucianists and Muslims

It is likely to build up a ground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Islam. It may not be a false assumption to think that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 will be in the future an important social and political component in the Malaysian society.

5. To compar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his research might be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one on this topic done from at least two points of view. The first one is Islamic: to introduce in depth the ample and complicated content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Muslim. The second one is of comparative nature: to discuss from the points of Chinese Buddhism, Taoism & Confucianism if possible.

「撰寫馬來伊斯蘭社會」研究計畫簡介

麥留芳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訪問教授

自數年前悉心投入馬來社會與宗教行為之研究以還，我每年都從田野工作中搜集了不少資料；其中包括了訪談、在地觀察、文件及文獻等。就地域而言，遍及了新加坡、汶萊、印尼、馬來西亞以及其東部的砂勞越和沙巴。由於有些現象及事件是具有時間性的，兼之行政上之需要，這時段中也草擬於好幾份論文及研究報告。

資料的浩繁及其不斷地湧現，那是搜不勝搜的，總得有個了斷的時候。我就趁今年比較有些空檔，乃決定把過去數年來的報告及累積起來的田野資料徹底整理一下，好好策劃撰寫專集的安排與步驟。以下是一些比較重要的考慮及安排。首先將以英文撰寫初稿；原因之一是其中涉及無數的外文，尤其是馬來文詞彙。這些詞彙都須翻譯成中文，若要在台灣既有的譯詞與尚待轉譯者之間取得更好的標準化效果，這些外文則須較後作專業化的處理。邊寫邊譯，必定分心。

另一考慮則是資料的補充。原來搜集好的資料，其有時空及內容上的限制，在撰專書時，皆須不時補充。中研院屬下的各所圖書館，尤其是民族學、社會學及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的有關藏書，近年來迅速增加，確已解決了不少文獻資料的問題。只是囿於客觀因素及研究方向，有好些館藏參考資料尚嫌欠缺。比如說，一本研究馬來社會不可或缺的期刊 *The Journal of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簡稱 JMBRAS)，自 1923 年刊行以來(前亦名之 *Malayan Branch*，更早則名之 *Straits Branch*)，便登載有浩瀚的相關論文與報告。R. Winstedt 和 A. H. Hill 分別撰譯的 *Hikayat Raja Raja Pasai*，就曾先後在該處刊載。在羅惠馨小姐協助下，我們發現所缺共 27 卷(且每卷所含期數時四時二)。對我來說，比較頭痛的是，好些想參閱的都缺期。上述 Hill 的譯作就付之闕如。

另外，馬來社會中流行且對馬來民族的價值觀和宇宙觀具有深遠影響的

hikayat 藏書甚少。這些類似中國的章回小說、演義體裁的著述，除較早期的（如上揭書及 *Sejarah Melayu* 等）已譯成多國（尤其是英文）文字外，餘者尚保存原文（馬來文）刊行，Liaw Yock Fang（廖裕芳）所述及的近 100 筆的 hikayat，館藏僅列 12 筆。

雖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善其事之功不逮、不周全，器利想只落得無事可善，或僅得個事倍功半。其事者乃指寫作的章節大綱，茲臚列如下：

第一章為導言，其中包含著三至四小節，如東方主義與馬來伊斯蘭研究的邊際化、東南亞伊斯蘭教的主要流派（什葉、遜尼、蘇菲等）、其共同點（伊斯蘭精英及其功能、宗教飾物的陳示）和伊斯蘭化的概念。

第二章將以東南亞整個區域的社、經發展作為主導，從而提取出一個發展的構想。擬議中的架構是該區的社、經發展乃繫於殖民者所留下的遺緒（軟體及硬體如制度及運輸航路）、華人文化圈的結構與趨向，以及伊斯蘭化的程度。本人過去浸淫於華人社會結構，希望此次能透過伊斯蘭化去獲得更多有關東南亞的變貌的啟示。

第三章裡所探討的將是馬來伊斯蘭社會的形成，馬來族文化的泉源（如上述 hikayat 等）、社會階層等。

接下來的第四章將探討馬來伊斯蘭命名制度及其變遷。過去兩三年來我一直不斷地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在性質上可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報導性或刊行資料，另一是調查方面的。後者已從古晉、峇里島及雅加達獲得；亞齊的則因政局動盪，尚未進行。前者的來源，除了報章新聞報導外，其中的法庭訴訟案件及訃聞亦非常有助於姓名稱謂的辨認。各地電話簿所刊載的訂戶的姓名，亦是相當可採信的資料。

在第五章的主要內容是建構一個東南亞伊斯蘭化的模式，內含開放性及封閉性兩類。汶萊國內實施「王權、伊斯蘭、馬來族」的建國原則，其伊斯蘭化的決意已昭然若揭，應是一種封閉性的模式。新加坡重商與高科技發展，以實務主義建國，宗教與種族並未賦予超然地位，其屬開放性的伊斯蘭化模式，應是順理成章。這個推理式的模式建構，尚有賴經驗資料的驗證，這一章將集中討論這些問題。

緊接上述第五章的課題，第六章將會探討馬來西亞這個以伊斯蘭教為官方宗教，但又不蓄意建立伊斯蘭國的國家，如何去經營國內的伊斯蘭化事務。它是需要經營的，因為在宗教行政的結構上，馬來西亞的宗教事務控制權為州政府所屬。其最終能否如汶萊一樣建立起「回教王國」，或選擇新加坡的社、經主導為建國原則，需視中央與地方政府角力的結果。即使經營，也必得苦心孤詣，全力

以赴。

東南亞最大的回教勢力在印尼。由於自蘇哈托下台後，印尼政局失控，動亂此起彼落，實在不適宜進行在地訪談與田野觀察的作業。本來選定地點峇里、泗水、雅加達及亞齊市，除前者外，都是暴亂之中心地帶。職是之故，第七章原則上僅能依賴二手資料去闡述印尼國內的伊斯蘭化及社會情況。

蘇門答臘島北部的亞齊地區，其舊有城鎮 Pasai，一直被視為伊斯蘭傳入的第一站和回教重鎮。此外，蘇門答臘南部、爪哇的日惹、馬都拉島以及偏遠的地區，伊斯蘭的色彩也很濃厚。換言之，大都會、華人聚居的城鎮以及印度教已紮根的地方，回教勢力就比較薄弱。外傳九成印尼人民信仰伊斯蘭教，統計數字上應無大誤。因為「建國五大原則」之信仰條的「必選一宗教」的規定，很多當地的土著都「選填」伊斯蘭教。另外造成印尼伊斯蘭聲勢浩大的原因是伊斯蘭的本質問題。數百年來學者們至今尚爭論不休的定義是「名目回教徒」(abangan) 不算回教徒？這第八章將為此問題帶來相關論述及他人田野研究的成果。

最末一章的主題為「皈依伊斯蘭的華人」或「華人回教徒」。早期有學者認為華人不改信回教的理由之一，是回教的地位卑微。但歷史上改信伊斯蘭教的馬來語群卻因為興都教、婆羅門教太重視個人身份地位，除不願與之結緣外，乃另尋一視同仁的回教。

許多華人伊斯蘭學者認為華人回教徒可以改善族群關係，原因是伊斯蘭重視有「教」無類。今日華人回教徒的訴求，正反映著馬來語群當年改信的情懷。華人信奉真主阿拉後，他們卻被馬來回教徒稱為「新進兄弟」，那麼，這會增進族群關係嗎？加諸改信者走過來時本已滿腹辛酸，他們豈不是「兩頭不到岸」嗎？在最後一章裡，我們將基於新加坡的訪談資料，配合鄰國的一些研究結果，來了解這個宗教認同與族群關係的課題。

最後，不妨稍提一下這種研究的困難處。首先，在東南亞這幾個選定社會裡，伊斯蘭教的研究，是相當敏感的；這為資料的收集帶來許多莫名的挫折。其二，馬來語群既是伊斯蘭的守衛，不論訪談、文獻的閱讀，都需要基本的馬來語文知識。由於大部份的馬來西亞馬來籍學生僅僅馬來語文，聘請研究助理一事頗費周章。除了溝通上會有問題之外，研究主題恐亦會帶來情操上的抗拒或不安。若馬來訪談員問受訪者是否每日祈拜五次，答案必是：「這還用問？！」若問的是華人非回教徒，你會聽到：「是否有點好管閒事？！」這類研究屬於「非常」研究，必亦以「非常」方式去處理。

「國家、宗族與新加坡金門人的國家認同」

研究計畫簡介

戚常卉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博士後研究學者

本計畫是博士論文金門研究的延伸。金門自清末大量海外移民啟始便成為僑鄉。僑匯在 1980 年前一直是金門人主要經濟來源。金門海外移民主要在東南亞地區，新加坡可說是金門人移民最多的國家。今日新加坡兩百多萬華人中，至少有十萬人是金門裔。新加坡金門會館和其他金門鄉社約有三十五處，維繫原鄉文化與認同。1980 年代，李光耀對原先高壓性新加坡國家認同政策改弦易轍，強調儒家化的新加坡文化。本計畫旨在瞭解新加坡政府從早期打壓宗族鄉社組織到強調儒家資本主義的國族主義政策，對金門裔新加坡人內部社會經濟關係之改變以及對他們和原鄉來往之影響。

匯回金門的僑匯應是逐年增加，這點可由華僑捐款興學，在家鄉置產建屋不斷增加推知。更重要的一點是，海外金門人介入金門地方事務之深與層面之廣與僑匯總數成正比。根據鄭林寬的調查，1938 年匯至金門的僑匯有 145,000 元。匯款總數雖無法與南安、安溪、惠安上百萬僑匯相提並論，但是與同安這樣的大縣相較亦不算少。

隨著金門人在僑鄉經濟能力的提高，金僑與原鄉金門的關係也日益增加。新菁英多半是僑鄉金門族群當中的領袖，本文以人數最多的新加坡為例，說明金僑如何成為家鄉的新菁英。這群新士紳非但不是孔復禮所謂的土豪劣紳，相反的，他們一如昔日的士紳，屬於保護式士紳。黃安基擔任新加坡金門會館總理時，和陳芳歲暨其他新加坡僑商一百二十三家，與金門當地士紳林乃斌等人一起請願將金門由翔風里提昇為縣治，二年後請願獲准，金門縣成立。1922 年，蔡嘉種、陳景蘭、陳煥武等有鑑於金門對外海上交通不便，成立金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建造金星號輪船一艘，往來金廈。我們雖無證據顯示金門輪船公司對金門商業發展有多少助益，至少對金門人到廈門採辦民生用品，甚至走水（跑單幫）都十分便利。金門公司對民生用僑匯幫助甚大，耆老歐陽晚池先生在訪談中表示，金星號尚未行駛前，由廈門轉匯到金門的民生用僑匯都要分數次帶到金門，有了金星號之後，匯款一次帶齊，加快僑匯匯款速度。1933 年，大陸沿海海盜猖獗，金門會館派黃肖巖、林則揚返鄉籌畫海防，建築碉堡。同時配合縣政府策畫保安計畫，成立各鄉聯防委員會，黃肖巖擔任主席。1936 年，金門會館再派黃肖巖駐金門公司接手前任縣長所辦公路未完成之事務，另一方面募款完成公路各段橋樑。1937 年金門淪陷引發逃難潮，當時廈門尚未陷入日軍之手，金門會館與其他地區南洋金僑在廈門設難民收容所安頓流離的鄉親。

二次大戰，金門淪陷日軍之手前，新加坡捐獻性僑匯協助公共事務方面有：捐教育經費辦商業學校與金門公學；興建後浦至官澳之中幹公路；辦理米糧平糶。金門地方部份基本建設是依賴新菁英的推動與僑匯才得以完成。1949 軍方接管金門，國家勢力完全掌控金門島後，海外華人在金門地方角色被國家取代，開始退出地方事務。事實上，軍方嚴防省親「華僑」播不當言論，凡有華僑親友探訪家庭，事後都會被村指導員約去談話。而在同時，東南亞新興國家開始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海外金門人的公益性僑匯金額減少。

金門人在新加坡

在殖民時期，華人宗親組織幫（bang）助鄉人在新加坡定居發展，也使得華人社會依附著 bang 成長分化。新加坡鄉社 有自己的勢力範圍，各方言語群以幫為中心，各自分開居住。新加坡殖民時期行業類別和族群有高度相關性。金門人在新加坡早期行業集中在貿易洋行、舢舨業、電鋸火鋸業。和其他早期海外華人一樣，新加坡金門人結社以同村或同宗族為主，金門會館是所有金門人的聯誼社團，最初供奉金門人的守護神陳淵，沿用家鄉廟宇名稱以孚濟廟稱之。殖民時期新加坡金門人是以宗教凝聚同鄉人，彼此互助。根據楊樹清報導，金門人初始依附在漳泉為首的福建幫，人數漸增後才脫離福建幫組織浯江孚濟廟和金浯江公會，後來內部又以出生地或產業又分出小型鄉社。金門鄉社建立在同鄉或同血緣的互信基礎上保障彼此既得利益。金門人數漸多後脫離福建幫，成立孚濟廟。孚濟廟是金門族集結行業勢力的聚所，建於 1876 年，最初為一廟宇，金門會館出現後，和會館合一。1975 年，政府徵用原址，廟宇遷到金門會館。1970 年代時，政府施行都市更新計畫，每個幫所提供的互助福利角色逐漸被國家取代。政府的新國宅政策設立許多社區中心，打破族群界線；居民委員會加強社區認同，其他跨族群和方言組織漸漸增多，幫的角色遂被取代。會員和會館漸漸疏離，幫組

織淡出華人社會。政府西化政策的國家認同建構的新一代華人生活。Chiew 指出在 1980 年代，84.8% 華人是新加坡出生，並認為自己是新加坡人，這群人對上一代信奉的神明沒有興趣。

1980 年代初期，新加坡政府修正原先的西化政策，鼓吹儒家價值，做為新加坡文化的基礎。宗親組織又開始復甦。原先的宗親組織成員的商業關係又活絡起來，有的宗親會辦托兒所，老人安養中心。他們和大陸的商業接觸變的頻繁，有許多投資是在宗親會協助下進行。中國政府也積極招攬海外華人到大陸投資。

從楊樹清書中的描述不太能看出早期國家認同政策對金門鄉社影響，金門會館似乎沒有受到新加坡政府強力瓦解宗親會而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加坡進行壓制各鄉社時，新加坡金門鄉社和原鄉的來往也被戰地政務阻隔。兩方面的打擊，並沒有解散鄉社，反而在新加坡政府從 1980 年代初期提倡儒家倫理資本主義後，1986 年金門人便在金門會館租約到期，立刻買下土地重新建館。新館成立後，積極籌組亞洲金門同鄉聯誼會，內部運作十分活絡。亞洲金門人亞洲聯誼會之成立是新加坡金門人跨向華人跨國民族主義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的指標。本計畫將會特別探討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金門會館內部向心力建構的機制和其他東南亞國家金門人網絡，主要目的在瞭解新加坡華人認同是否是分裂性認同。

本計畫研究方法首先從金門新加坡鄉社組織與其活動，和鄉社和其成員人際網絡兩方面著手瞭解國家認同政策對他們的影響。其次，瞭解他們資本投資路徑以及他們和金門與中國大陸互動關係。

「攜手並進的市場與國家力量：變遷中的東南亞 台商勞資關係」研究計畫簡介

龔宜君* 王宏仁** 張翰璧***

在全球化的生產基地外移狀況下，許多台商的人權記錄一直被批評，因此，本研究希望根據最新發展的國際勞動人權運動趨勢，來探討保護勞工的措施方面，是否可以找出一條有別於傳統「國家力量介入」的方式，透過 NGO、消費者團體等商品市場(commodity market)的需求面力量，來達到多層的勞動保護。

台商在海外投資金額與件數不斷增加，他們對於當地勞資關係的影響也引起學界的重視。現有的許多社會學的田野調查發現，台商在中國與東南亞的勞動控制，都傾向於比較威權的管理方式。由於這樣不良的勞動狀況，引起了西方 NGO 團體的注意與反彈，一系列的抵制 NIKE 運動，對於歐美採購大廠造成很大的壓力。此外，NGO 團體也把戰線拉到 ILO、IMF、WTO 與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要求在進行所謂的經濟改革時，必須注意勞動人權的問題，並且試著將貿易問題與勞動人權問題掛勾。

為了應付龐大的社會輿論壓力，西方的廠商開始要求其代工廠必須遵守嚴格的勞動規約，並且透過公正的查核機構來進行勞動檢查。除此之外，在美國也成立了一個所謂 SA8000 的組織 (Social Accountability)，希望透過一個認證的過程，來讓消費者瞭解到，他所購買的產品是否符合國際勞動人權標準。

這樣的發展，把勞資關係帶到了一個新的狀況：勞動條件的維持，不僅僅只是依靠國家力量介入、或是勞資雙方的談判，而是透過 NGO 的中介，把商品市場中的消費者力量帶進來，來影響勞動市場的買賣關係。

*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專任副教授，本計畫合作計畫主持人。

**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中心專任助理教授，本計畫合作計畫主持人。

***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專任助理教授，本計畫合作計畫主持人。

那麼以臺灣的產業結構來觀察，基本上臺灣做的產業都是「代工」，即使號稱所謂的高科技產業，也都是代工生產，主要的訂單買主也都是歐美的廠商。而假如上述的發展若持續下去，所有臺灣的代工廠必然要面臨相同的要求：符合國際勞動規約。而在海外的台商公司，只要是幫歐美大廠做代工的，必然也要符合這樣的新趨勢，也就是必須接受來自公正第三者對於勞動條件的稽核檢查。

面對這樣的新趨勢，我們的研究希望探討的也就不是企業管理方面的「人力資源問題」，而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三個面向的問題：

一、在台灣與東南亞的台商，面對來自歐美勞動團體、消費者團體等 NGO 組織的壓力時，勞資關係的變化如何？

二、所謂「勞動市場的交易買賣」，到底是鑲嵌於何種社會條件下產生的？

三、更大的問題是，市場的力量如何透過人類的管理與運作，而轉為具正面性的力量？

以往對於勞資關係的探討，總是圍繞在勞資雙方與國家的角色，並且認為假如勞動力任由市場決定，勞動條件必然會往最差的方向沈淪。但本研究則將探討「消費者的市場力量」介入時，市場力量對於勞動體制的影響是否可能為正面的。

對於台商在海外的勞資關係，從不同的學科背景卻有不同的看法，管理學方面的研究多半是著重在如何「有效率地」管理當地的勞資關係。這樣的研究取向，還是以實務導向為主，對於東南亞當地國的勞工與勞資關係，基本上是一種類似「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凝視角度，完全抽離當地的時空背景。例如趙必孝就是以系統觀點，將台商在大陸的人力資源的管理分類為「輸入控制」(含甄選與訓練)、「行為控制」與「產出控制」等三方面，整個的思考模式就是要如何控制，使得整個工廠的運作可以達到最高效率。

但是在社會學的研究方面，對於台商在海外的勞資關係，就完全採取不同的路徑，多半都從比較批判的角度出發。蕭新煌、金潤泰的研究指出，大陸台商的勞資關係為中國的工作倫理帶來某種全球化文化的作用；蕭新煌、龔宜君發現，有「台灣關係」的東南亞華人留台生與台商之間具有某種親近性，這樣的勞資關係不是透過族群關係而來的；龔宜君更發現，台商與馬六甲當地各不同族群也建立起親疏各異的族群關係；與馬來族群發展出最為疏離的勞資關係與孟加拉族群間則形成共生的勞資關係，與華人間形成的是中介幹部的關係，與留台生華人間則形成核心的互賴的關係；王宏仁與蕭新煌對於越南台商的研究則指出，在越南的台商工廠中雇用許多的中國籍管理幹部，原因並不在於薪資的差異，而是一種關係性的鑲嵌 (relational embeddedness)，也就是某種類型的社會資本所形成的一套勞動管理模式；曾熾芬、龔宜君、蕭新煌等人的研究則發現，在印尼的台商，

對於當地的勞動控制手段嚴密，而且更專制；周素卿等人對於馬來西亞三家大型台商公司的研究則指出，公司各部門的主管多半是當地人，這是所謂的「本土化政策」所致。

也有學者探討了國家在外資公司中的角色，並且認為國家在外商的勞資關係上面，可以扮演更大的角色。比較了中國與越南的工會發展，這兩位作者發現越南政府對於工人的保護，因為歷史上的原因，相較於中國，採取比較支持的態度，甚至越南工會可以影響政府的政策。

但是以上的研究，都沒有觸及最新的發展趨勢，也就是西方勞動人權與消費者團體對於第三世界代工廠勞資關係的影響。雖然曾熾芬等人已經注意到此現象，指出「小廠因此而被迫關門」；但是對此新興的現象尚未有進一步的解釋說明。而我們認為在全球化潮流下，消費者團體在勞資關係上面的作用是必須更深入研究的。

迄今為止，尚未有任何的中文文獻針對此歐美勞動人權團體與第三世界國家代工廠的勞資關係進行討論，因此本研究將是國內第一份針對此問題的研究報告。至於西方的學界，已經逐漸注意此現象，但到目前為止的討論，多半僅止於 NGO 組織之間的論爭。基本上，透過消費者團體、勞動人權團體而進行的勞動規約檢查，或是透過類似 SA8000 組織的認證過程來改善第三世界國家勞動條件，都可以有效地改進第三世界國家代工廠內的勞動人權，雖然可能還不是處於最佳的狀態。至於這種以歐美 NGO 組織力量的方法來改善勞動人權有何問題，最近 Labor Rights in China (LARIC) 則嚴詞批評 SA8000 根本就是一種煙幕彈，他所列舉的三點理由為：將勞動人權私有化、對於群眾運動產生不利影響，以及形成進行驗證的大公司如 PricewaterhouseCoopers 控制了工人的勞動條件權力。這樣的爭論還在進行當中，將來的發展會如何，這也是本研究希望探討的。

由於我們希望探討的問題還在形成當中，並且可能成為未來重要的社會運動與發展指標，現在以東南亞台商工廠內部勞動人權、勞資關係為對象來進行研究，可以讓我們明瞭這樣的運動持續發展下去的話，台灣廠商（不管在台灣或在海外的）都必須面臨新一輪的勞資關係重組，而對於台灣的勞工運動而言，這也是另外一項新發展，可以提供他們更多的武器來保障自己。換言之，本研究的目的也就在於三點：

一、探討西方 NGO 組織，如何透過市場機制的力量，來影響替歐美大廠代工的台商內部勞資關係。

二、探討臺灣廠商在台灣與在東南亞的子公司，在面對歐美買主的壓力下，是否有不相同反應模式？

三、探討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市場如何可能成為一種轉化性的力量？

如此一來，我們將可以清楚理解在全球化的商品生產過程中，NGO 組織的力量可以抵達到勞資關係的程度有多深？也可以找出在台灣工廠對此勞動人權要求的反應，以及跟在東南亞子公司的反應有何差異。同時，找出台灣社會類似的機制，將市場的力量轉換成一種建設性的力量，以改善台商工廠員工的勞動條件。

「印尼『教士復興會』發展史」

研究計畫簡介

游謙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本計畫合作計畫主持人

在宗教的發展中，傳統勢力往往不敵現代改革派的衝擊，然而印尼「教士復興會」(Nahdlatul Ulama)之例，卻在1999年以傳統派(traditionalists)的勢力擊敗現代改革的挑戰，取得國家領導地位，可以說是這普遍現象的反證。本研究主要是深入探討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組織—教士復興會在印尼的發展，從它的歷史發展脈絡中，追尋它在當地屹立八十年所面對的各種困難和改變，如何不斷地調整自我重新適應現代社會的變遷。在教士復興會主席瓦希德 (Abdurrahman Wahid) 當選總統後，印尼政治上(亞齊、伊利安查亞)的分離運動以及宗教上(亞齊、馬魯古)的信仰衝突…等種種問題，不斷考驗傳統勢力如何去應對，現今詭譎多變的局勢的確值得我們仔細觀察研究。本研究計劃將重點立基於1、教士復興會的草根基礎；2、教士復興會如何因應印尼各個歷史階段的變化；3、教士復興會如何與拉伊斯 (Amien Rais) 所領導的改革派(Reformists)「先知使徒會」(Muhammadiyah)競爭，成為最有權力宗教組織。

教士復興會正式成立於1926年，其成立的目的是源於受到「先知使徒會」崛起的刺激。在早期印尼伊斯蘭 (Islam in Indonesia) 並沒有類似於這兩個組織的宗教團體出現。當地穆斯林 (Muslims) 從來沒有懷疑過傳統教士 (ulama) 的領導，直至現代科技的發達，使得前往麥加朝聖的信徒不只有傳統的教士家庭，這些新興的朝聖階級回國後不斷地在教義和文化上，挑戰傳統的教士，甚至發起發起「先知使徒會」。基於新興的朝聖階級的威脅，傳統教士團結一致成立了與現代改革派對抗的教士復興會，並且成為印尼最大的宗教團體，同時更是全世界最大的伊斯蘭組織。

印尼人在荷蘭統治前即信仰伊斯蘭，但是因為當時的人民識字率不到一成，伊斯蘭教義大部份是用口頭的傳播，所以當地的接受者有時候會摻入自己原先的民俗文化，因而形成所謂的「民間伊斯蘭」(Folk Islam)。印尼大部份的穆斯林都是屬於這種信仰型態，他們對抽象的教義和伊斯蘭法(shariah)並不重視。幾百年來印尼的統治者，如荷蘭殖民政府、蘇哈托政權都政策性地鼓勵這種信仰，這一種伊斯蘭的信仰稱之為掛名派。與掛名派相對的，就是敬虔派(santri)，這些人時時把宗教記掛在心裡，表現於行為。例如伊斯蘭規定如果經濟與健康許可的話，每位穆斯林一生至少都要到麥加朝聖(Haj)一次，敬虔的穆斯林為了完成這個規定，就會省吃儉用，累積金錢籌足朝聖的旅費，再辛苦也要到麥加走一趟，如果自己無法完成這個心願，也要想辦法讓下一代完成。

因為早期朝聖需要大量的金錢，所以敬虔派的穆斯林都有累積財富的強烈動機。而有到麥加朝聖過的人會被敬稱為「哈吉」(Haji)，並且成為地方宗教活動的重要人物。哈吉通常會在清真寺旁，由信徒奉獻的土地上興建學校，成為教導大家學習經文的教士(ulama)。而且這些教士常常都是半世襲的，也傾向互相通婚，在鄉村地區，有錢人大多是教士，哈吉常常是有錢人的代名詞。

在都會地區的教士經濟也很寬裕，因為伊斯蘭信仰是由阿拉伯商人從商港傳入的，所以初代穆斯林往往也與商業活動相關，他們也從阿拉伯人身上學得許多進出口貿易和跨國經營的技術。因此雖然仍有相當比例的教士和掛名派一樣相信「明師」(dukun)、儀式、醫病、算命、法術等，他們的經濟生活和價值觀和掛名派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說在 1926 年創立「教士復興會」的瓦哈伯(Wahab Chasbullah)在當時就擁有美國進口的汽車在市區行走，同時擁有一台重型哈雷機車在鄉間奔馳。

「朝聖」這個規定是形成傳統教士階級的重大原因，但也因為「朝聖」使得這些傳統教士的地位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十九世紀末期，由於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以及汽船(steamship)的普及，使得阿拉伯世界與印尼的距離拉近，開始有大量的東南亞穆斯林到麥加去朝聖或到中東去留學。他們發現原來印尼的伊斯蘭與中土的形式竟然差別那麼大。

這些新興的朝聖階級回國後，就發起一波又一波的伊斯蘭改革運動，企圖使印尼的伊斯蘭變成中土正統的形式，這波運動最具代表性的組織的就是「先知使徒會」。「先知使徒會」的創辦人達賀蘭(Ahmad Dahlan 1868-1923)原本是爪哇中部一個蘇丹王城裡的清真寺人員，他到中東留學後把起源於埃及開羅的伊斯蘭現代運動帶回印尼，並於 1912 年創辦「先知使徒會」。該會由於組織力強、方式新穎、成員少壯、以及我群意識強烈，使得這波新運動帶給傳統的教士莫大的壓力。「先知使徒會」的領導人達賀蘭有好幾次帶領同好與傳統派的教士舉行公開辯論，1922 年在西爪哇舉行的印尼穆斯林大會中，改革派指責傳統派是多神

信徒 (syirk)，傳統派則指責改革派是「非穆斯林」(kafir)，印尼的敬虔派穆斯林從此就分裂成兩大陣營。由於改革派視阿拉伯世界為他們的信仰「中土」，他們與中東的連繫十分密切，1926 年一月改革派代表印尼穆斯林參加在「中土」麥加舉行的大會，但是卻不邀請傳統派的代表。遭受這個嚴重的打擊，同年，在瓦哈伯的奔走下，傳統教士終於大團結，成立「教士復興會」。

教士復興會的歷史大約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剛成立階段，教士復興會是以社會宗教的組織(ajamiah diniah)形態出現，它所關心的範圍是宗教的、教育的、和經濟的活動，包括了改善傳統的教士、提升伊斯蘭的經學院、重新檢查經典以及具體建設穆斯林的農業和貿易事業。教士復興會在戰前快速的傳遍，1933 年它已宣稱擁有四萬的成員，1938 年增至十萬，增加了超過九十九個分支。在中期階段，教士復興會逐漸和政治扯上關係，1930 年它加入了其他的伊斯蘭組織來反對殖民政府，並開始對抗殖民政府，並支持 GAPI (Gabungan Politik Indonesia or Indonesian Political Association)的成立，1939 年成立印尼的國會，直到 1945 年才成立了正式的政治團體，在 1955 年印尼首屆選舉時拿下百分之十八的選票，成為全國第三大政黨，這樣的水準一直保持到 1971 年。而在 1950 至 1960 年早期，它為了在政治內保有它的地位，修改了早期創立時的一些理念以迎合政治現狀。在蘇卡諾(Sukarno)的時代，教士復興會已形成一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政治團體，這時它的政治傾向是支持政府的政策，但是到了蘇哈托(Soeharto)的新秩序(New Order)時代，因為擔憂為政治上的犧牲者，既而成立 the United Development Party (PPP)，轉而對抗蘇哈托政府近期階段，因為政治理念的差距，教士復興會在 1984 年時聲明，逐漸淡出政治圈，專注宗教與教育的領域，建立許多學校與醫院，他們並且推選在穆斯林世界地位崇高，又是該會創辦人瓦哈伯的孫子瓦希德擔任主席。多年來，瓦希德可說是印尼最受爭議的人物之一，他自 1984 年即掌控擁有四千萬會員的教士復興會。根據 Martin van Bruinessen 的觀察，在伊斯蘭的世界沒有類似這樣以教士(ulama or religious scholars)為首的強大團體。教士復興會主席瓦希德現年五十九歲，擁有開羅大學的阿拉伯研究學位及巴格達大學的文學學位，在前總統蘇哈托威權統治的十四年期間，同時身為知識與宗教領袖領袖的瓦希德，便擅於運用他在社會影響力，巧妙地對政府當局發表議論，並且極力促進印尼國內各宗教派系之間及社會上的寬容。

在 1999 年印尼的總統大選，代表傳統教士派的瓦希德奪得了總統寶座，打敗了改革派的伊斯蘭政黨，將印尼伊斯蘭的傳統勢力再度推向高峰。雖然如此，但是對於瓦希德而言，政治、宗教上的種種問題才要開始，首先，境內的分離運動：除了東帝汶早已獲得獨立之外，瓦希德政府尚需面對亞齊、伊利安查亞等要求獨立的運動。然而宗教的問題也沒有讓新政府好過，亞齊、馬魯古省的信仰衝突不斷擴大，再再考驗著傳統勢力如何因應現代社會的變化。

「台灣與南海地區之衝突管理」圓桌學術討論會 會議召開情形報告

宋燕輝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壹、前言

過去數年來，台灣一直被排除於出席與南海事務相關之「第一軌道」(Track One) 區域安全對話，尤其是「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之各項相關會議及其下之工作小組。即使台灣得以參與「第二軌道」(Track Two) 之區域安全對話，舉如「亞太安全合作理會」(Council for Asia-Pacific Security Cooperation, CSCAP) 與印尼主辦之「南海會議」(Workshop on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但參與的性質、地位與實際功能也受到相當程度的約束與限制。台灣學者是以「其他參與者」(other participants) 的身分參與 CSCAP 之各項工作小組會議；台灣也是所有「南海會議」與會方唯一未曾主辦過與南海事務相關之技術工作小組會議者。最近的實例是：台灣被排除於研商通過南海地區行為準則之對話過程。

台灣係南海六個島嶼主權及海域管轄權聲索方之一，且一直實際有效佔領東沙群島及南沙群島中之最大島嶼——太平島。惟我非東協會員國、非其對話夥伴、亦受東協在中共施壓下持「一個中國」政策立場之制約，無法有效參與與南海問題相關之區域安全對話。過去數年來，我政府相關單位持續努力強化台灣在南海問題之發言地位與爭取應有之參與權利，但實際成效有限。

茲為提升我國在南海問題上所扮演之角色及發言地位、增加台灣參與與南海問題相關安全對話管道的機會、強化與東協合作關係、突破中共對我參與亞太地

區安全機制之打壓封鎖、擬定我國參與區域安全對話機制之有效策略，因此，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與歐美所共同主辦，以及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協辦，於二月五日召開「台灣與南海地區之衝突管理」圓桌學術討論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針對如何強化台灣參與與南海問題進行小型圓桌討論。此外，主辦單位也特別向行政院南海小組、內政部、國防部、海岸巡防署等單位提出申請，安排四名國外與會學者參訪東沙群島，除一方面宣示我國之主權外，另一方面介紹我國在東沙所將進行之觀光開發活動。此參訪活動也更進一步使國外學者了解我國東南沙換防的善意行為，以及我國採和平方式維護南海區域穩定與安全的主張和誠意。

貳、會議召開經過情形

二月四日（星期日），五名國外與會學者（新加坡大學政治系系主任李勵圖教授、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資深研究員馬克·瓦倫西亞博士、菲律賓戰略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及菲律賓大學政治系教授卡羅萊娜·赫南德姿、印尼前無任所大使及目前擔任印尼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與印尼海洋事務與漁業部特別顧問的哈信·賈拉博士、以及馬來西亞海洋研究所前主任翰植博士）先後抵台。主辦單位於中央研究院歐美所以簡便餐會歡迎國外與會學者。部分國內與會者，舉如，總統府資政姚嘉文先生、葛敦華將軍、台灣綜合研究院第四所所長林碧炤等，也應邀出席此歡迎會。

二月五日（星期一）早上八時四十五分至九時十五分，國內外與會學者紛紛報到註冊，領取會議資料。九時十五分，會議在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主持人蕭新煌博士與中央研究院歐美所所長林正義博士致開幕與歡迎辭後，會議正式開始。

第一場討論之議題是：「台灣與南海地區之衝突管理：台灣之觀點」，由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主持人蕭新煌博士擔任主持人，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宋燕輝博士提出有關我國新政府可能採取之南海政策之報告，以及林正義博士提出我國東南沙撤軍換防政策決定之分析。印尼的賈拉博士擔任評論人。宋博士的報告指出，我國新舊政府之南海政策大致上並無大差別。有相異處是在有關歷史性水域與南海中沙與西沙島嶼主權之主張上。此外，新舊政府對「南海小組」之功能、位階、以及組織架構上之看法也有所不同。在未來，新政府之行政院長張俊雄與總統府資政姚嘉文有可能在南海政策制訂過程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林博士對東南沙撤軍換防政策決定所作分析的結論是：政府在立法院施壓下，並未完全將東南沙予以非軍事化。台灣試圖由國際開發計畫強化對南海島嶼

主權之主張，同時喚起國人對南海島嶼重要性之意識。影響東南沙撤軍換防政策決定主要因素包括經濟發展、海岸巡防署之新設立、以及中共武力攻擊可能性之減少。但是，林博士強調，此政策之宣布與執行顯示政府相關部門缺乏協調，其後政策說明也不夠。儘管如此，台灣降低南海緊張情勢與一向所主張區域合作的立場並未改變。至於東南沙之撤軍換防是否會損及我國之主權，此有待進一步觀察。應該注意的是，台灣的安全有可能因為東南沙之撤軍換防變得更為複雜化，蓋中共有可能在未來對東沙採取軍事行動，對台灣海峽進行封鎖。基此，林博士建議，如果東沙佈署地對艦飛彈，其防衛能力可獲增強。

評論人賈拉博士首先指出南海爭端國際化問題。他說，似乎台灣支持南海問題國際化，但中共是反對的。東協會員國對此問題之立場亦不一致。馬來西亞是反對南海爭端國際化問題。就實際性而言，賈拉博士本人也是不支持南海問題國際化。但國際社會上，的確有不少與南海問題之會議召開。此可分為政治性與學術性之會議。就前者而言，台灣之參與是有問題，主要是中共之反對。但學術會議方面，台灣之參與並無問題。台灣無法參與「東協區域論壇」以及「中共與東協之對話」。但是台灣自 1991 年開始參與了印尼所主辦的「南海會議」非正式對話過程。一開始，中共反對台灣之參與。後來同意是因為「南海會議」是非正式的會議，與會者是以個人身份參與，且會議之決議僅具建議性，以及會中必須採共識決達成任何決議。賈拉博士評論中強調不了解台灣與中共就南海問題所採之立場，也不清楚南海九條斷續線究竟是代表著何種的島嶼主權或水域的主張，此有待釐清。至於「南海會議」之成效方面，賈拉博士認為只要能夠防止衝突擴大，或將非正式建議事項傳回給各相關國政府並被採納，此會議就有正面的成效。此外，在共同開發方面，賈拉博士曾提出兩次建議，一次在 1994 年，一次在 1998 年，但都無結果。如果其他聲索國都不採實際行動，將使中共之南海政策目標得逞。

賈拉博士評論完之後，主持人開放給所有與會者發問或評論。新加坡大學李勵圖教授首先指出他個人對「南海會議」成效感到頓挫。其次，他也想知道台灣如何處理南海政策上的矛盾兩難問題，亦即，一方面，要支持北京對南海島嶼主權的主張；另一方面要與東協會員國保持友好關係。李教授想知道台灣有何政策提議或腹案。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資深研究員馬克·瓦倫西亞博士隨後發言，指出，此次會議之召開是意味著台灣南海政策將作重新調整？還是只是另一場學術研討會之舉行？東吳大學劉必榮教授提出兩個問題。首先是有關宋博士報告中所指新政府可能會改變領土範圍與南海 U 型線的問題；其次，此一做法有與中國分離之涵意，對中共而言，會不會太過挑釁？馬來西亞海洋研究所前主任翰植博士發言支持南海島嶼海洋觀光開發之提議，也對台灣東南沙之撤軍換防做法表示支持與讚賞。他認為南海各爭端國應多採取此種透明化、非軍事化的舉動。此外，他也建議台灣應採與中共有別之南海政策，明確指出台灣之主張立場。

林正義博士先對瓦倫西亞博士所提問題作回應，指出會議召開並非意味著政府政策之重新調整；學術會議之召開為主要目的。宋燕輝博士也對兩岸在南海問題上之互動、歷史性水域、南海島嶼主權、南海海洋觀光等問題一一作出回應。

第二場討論之議題是：「台灣與南海地區之衝突管理：東協之觀點」，由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何思因博士擔任主持人，菲律賓戰略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及菲律賓大學政治系教授卡羅萊娜·赫南德姿、馬來西亞海洋研究所前主任翰楂博士、以及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第一副主任金必勝提出報告。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陳鴻瑜擔任評論人。赫南德姿教授在報告中指出，由於東協國家與其他國家都建立有外交關係，因此不太能體會台灣突破中共外交封鎖之立場與所作之努力和困難。她也指出，台灣在南海問題之處理上的確出現一個政策困境，亦即，一方面要提昇、改善與東協之外交關係，另一方面有中共之壓力。就台灣在南海衝突問題上所扮演之角色，赫南德姿教授認為東協國家應支持台灣參與第二軌道之所有對話過程、台灣應持續努力改善與中共之關係、同時持續在南海問題上扮演建設性之角色。她建議，台灣本身對南海問題應有一致立場。她對林正義博士所提在東沙佈署地對海飛彈之建議認為是有負面作用。儘管台灣無法參加中共與東協有關通過南海區域行為準則之協商，但台灣可採「走後門方式」(backdoor approach)在第二軌對話過程或會議中說明台灣之立場，尋求其他國家之支持。台灣甚至可考慮片面宣佈南海行為準則。赫南德姿教授指出，一九九五年美濟礁事件發生期間，前總統李登輝曾私下知會菲律賓總統，表示台灣不會採取使問題複雜化的動作，此乃片面善意、正面的做法。此外，台灣應持續參與「南海會議」。赫南德姿教授表示，此次參加「台灣與南海地區之衝突管理」圓桌學術討論會是一個冒險的決定，因為中共一定會反彈。但是作為一個獨立之學術研究工作者，她並非政府官員，因此，會持續提出個人意見，舉如，她反對菲律賓在中業島修建飛機跑道、反對馬來西亞新佔南沙的榆林暗沙與簸箕礁。

馬來西亞海洋研究所前主任翰楂博士在報告中指出，南海問題相當複雜，短時間要予以解決是不可能。目前最佳做法是尋求共存、維持現狀、建構危機管理機制、維持和平。歷史不得被用為唯一支持主權主張之因素，蓋其他國家也有在南海活動之事實。翰楂博士也反對爭端國以武力解決主權或管轄權的衝突問題。南海衝突主因除包括資源外，戰略考量也很重要。但大型戰爭在南海爆發之可能性極低。就台灣之政策而言，翰楂博士認為台灣之政府應檢討與北京的關係，在尋求一個獨立的外交政策同時，思考如何維持台灣領土完整之問題。倘若太平島失守，是否台灣的核心利益就受到威脅？台灣對所佔南海島嶼也應採取一個更透明化的南海政策，開發成海上觀光勝地對台灣維護主權是有利的。台灣應持續向國際社會宣示放棄武力之使用，並降低所佔島嶼之軍事存在，改派海巡署人員駐守。台灣也應繼續支持南海地區之所有信心建立措施，其中包括接受東協所提議通過之南海地區行為準則。台灣也應採取一個有別於中共之南海政策。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第一副主任金必勝之所以被邀請與會，主要原因是越南研究南海問題之學者無法來台，但越南卻又是南海主要爭端國之一。而最近越南與中共達成東京灣海上劃界與漁業合作協定。原意是請金先生說明與中共之談判進展，以及相關南海問題。但金先生在會中的報告並無任何價值。

政大歷史系教授陳鴻瑜評論時表示不應接受任何排除台灣參與所通過之南海區域行為準則，也駁斥翰植博士有關歷史的一些論點。在開放給與會者發問時，瓦倫西亞博士指出，翰植博士所稱南海情勢維持現狀的論點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南海情勢一直在改變發展中，且危險性有增加的趨勢。兩岸關係對南海情勢會有相當重要之影響。賈拉博士建議台灣採 APEC 模式 (economic entity) 或中西部太平洋漁業組織模式 (fishing entity)，或以「行政實體」(administrative entity) 等方式尋求國際組織之參與，或國際協定之簽署。他指出，或許許多 entities 地位的取得可演變成事實的參與。至於南海問題之處理上，他認為不應太過於強調主權，因為此問題相當複雜難處理。此外，爭端國亦應考慮採取第三方之處理解決爭端方式，舉如訴諸於國際法院。最後他指出，究竟南海情勢是走向更危險的方向，還是走向更和平的方向，此可爭辯，但不管如何，目前應關切的是如何處理。赫南德茲教授發言指出台灣之所以被排除參與東協與中共南海區域行為準則之對話過程主要是中共反對。但台灣應考慮片面接受此準則。正如聯合國人權宣言，開始只有五十多國簽署，但後來幾乎被世界各國接受。南海區域行為準則之情形亦應如此。赫南德茲教授對台灣以 entity 名義或方式參與南海問題的可能性表示存疑。翰植博士發言指出南海島嶼並無居民長期居住的事實。此外，發現古物並不表示就可主張發現古物該地的領土主權。他也認為，台灣片面接受南海區域行為準則會對台灣會有正面的影響。

第三場討論之議題繼續上一場有關「台灣與南海地區之衝突管理：東協之觀點」的討論，由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胡為真任主持人，印尼前無任所大使及目前擔任印尼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與印尼海洋事務與漁業部特別顧問的哈信·賈拉博士與新加坡大學政治系系主任李勵圖教授提出報告。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林文程教授擔任評論人。

賈拉博士的報告主要是與東協對南海問題之立場有關。他指出，東協是在 1992 年始開始注意南海問題，主要原因是該年中共通過宣佈其領海法，其中重申中國對南海島嶼之主權，以及該年中共與美國克瑞史東石油公司簽訂在南沙探油之合同。為何遲至 1992 年東協才注意此問題，主要原因也包括：(一) 東協不認為此問題會造成大衝突；(二) 並非所有東協會員國為南海島嶼爭端國；(三) 東協會員國本身之間也有島嶼主權領土糾紛；(四) 部分東協國家與中共關係良好 (舉如泰國)。1992 年後，東協注意南海問題，且在資深官員會議或外長會議、或後來的「東協區域論壇」、東協與歐盟之對話、以及不結盟團體等都將南海問題列入討論議程。1995 年美濟礁事件發生後，東協立場更加鞏固，採取一致立

場。但賈拉博士認為應該說是採取共同之哲學立場，亦即和平解決爭議、避免衝突，而非解決主權爭議之共同立場。至於在「南海會議」當中，東協會員國不同立場也出現，主要是採取何種途徑與中共就有關南海問題打交道。有會員國認為應採雙邊途徑；也有堅持多邊途徑。此外，有關「南海會議」究竟會達致何種成就？會員國之間看法也不同。有的認為領土主權問題不解決，「南海會議」不會有任何成效。但賈拉博士認為領土主權問題一時甚難解決，因此，在此問題解決前，應先有一些措施使衝突不致擴大。亦即，將主權問題擱置一旁，採取合作措施，避免衝突擴大。「南海會議」召開初期，曾討論領土主權問題，但後來中共、馬來西亞反對。台灣立場似乎採兩者均可。後來，「南海會議」之重心移轉至技術性問題。有關南海區域行為準則方面，中共立場很矛盾。最初反對在官方層次討論，傾向在非正式場合討論，但後來態度對調，改成要求中共與東協進行官方磋商，反對在「南海會議」討論。賈拉博士認為此立場之改變是針對台灣而來。但不管如何，「南海會議」還是會繼續討論南海區域行為準則問題。台灣應在「南海會議」中繼續堅持提出此議題。至於台灣是否接受中共與東協南海區域行為準則的問題方面，或許台灣應尋求 APEC 與中西部太平洋漁業組織的先例，另外簽署遵守南海區域行為準則的文件。如果台灣硬要以獨立國家身份簽署南海區域行為準則，一來，此必招中共強烈反對；二來，也將東協會員國推入一個甚難處理的局面（結果，東協在一個中國立場下，是不會支持台灣的）。但假使台灣採用 APEC 與中西部太平洋漁業組織的模式，也許還有成功的機會。

新加坡大學李勵圖教授提出六點報告。首先，他指出，雖然有許多雙邊或多邊有關南海問題之對話，但不要期盼太多具體的結果。其次，要求中共放棄南海領土主權之主張是幾乎不可能之事。中共是南海地區之主要行為者，但其行為受下列三個因素制約：中共之軍力、與東協之外交關係、以及美國之影響。第三，北京與台北在南海問題上有合作之可能。南海問題之討論與兩岸關係無法分開。第四，東協對南海問題之處理意見並不一致。第五，非爭端國支持安全對話，支持和平方式解決爭議。第六，儘管雙邊或多邊有關南海問題之對話甚多，也有許多信心建立措施、預防外交、或共同開發提議被提出，但最缺乏的是真正合作的政治意願。

中山大學林文程教授評論時指出，由於中共之人口增加、經濟發展迅速，未來中共之南海政策將更趨強硬。他也認為美國在南海會扮演一個更為重要之角色。東協要採取一個共同的南海問題立場，基於會員國國內政、經問題的存在會有困難。至於台灣的南海政策方面，有兩派之學者或想法。一者強調與中共合作，並採取較為強硬之南海政策；另一派認為加強與東協國家關係較為重要，因此，建議在南海採取較為低調之立場。

林文程教授評論完後，主席開放給與會學者發問。翰植博士首先舉手提出有關雙邊或多邊途徑處理南海爭議的看法。他指出，馬來西亞一向採取雙邊途徑與

相關國家磋商，此乃馬國一致持續外交政策之表現。赫南德茲教授隨後也發言表示，小國是傾向採取多邊途徑去處理爭議問題。至於是要採用雙邊或多邊途徑處理爭議，此有賴爭議方人數與爭議之性質而定。南沙涉及多方就應採多邊途徑。宋燕輝研究員發言指出，美國最近在南海與爭端國或其他周邊國家所進行之元首訪問或軍事演習活動值得注意。其次，東協國家應考慮以 co-operative Entity 的觀念或名稱接受台灣參與東協與中共進行之南海區域行為準則磋商。東協與台灣之未來互動亦可朝該方向發展。至於行為準則方面，宋研究員指出，必須注意此非法律文件，以及過去南海周邊國家違反所簽署行為準則之實例。台灣是有可能片面宣佈一個南海區域行為準則。賈拉博士最後回應時指出，他對南海問題之處理是抱持樂觀態度；同意美國將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的看法；至於雙邊或多邊解決衝突途徑問題，應依問題之性質而定；台灣以「合作實體」名義簽署南海區域行為準則之可能應由台灣政府自己去推動實現。李勵圖教授最後再強調美國的可能影響，舉如美國航母將使用新加坡之軍港。

第四場討論之議題是：「台灣與南海地區之衝突管理：鄰近國家之觀點」的討論，由外交部研設會主委羅致政擔任主持人，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瓦倫西亞博士提出報告，東吳大學教授傅崑成作評論。原本規劃邀請之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湯森果教授因教學關係無法與會。瓦倫西亞博士的報告中指出，台灣南海政策的困境是，一方面要與其他爭端國或海權國家維持友好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又恐被中共指控未盡維護南海島嶼主權之責。此外台灣試圖以南海島嶼主權主張，參與「南海會議」尋求外交之承認，或加入「東協區域論壇」。但中共極力反對，東協也不願被夾入中共與台灣之主權爭議中。台灣在處理南海問題上，也出現認同危機問題。在南沙問題上，台灣立場似乎與中共完全一致。此造成東協國家之猜疑。此外，瓦倫西亞博士認為台灣應放棄九條斷續線內歷史性水域之主張，反對中共在西沙所宣布劃定之領海直基線，並提出交由國際法院決定南海爭議島嶼之主權。美國在區域內之一項重要利益是航行自由，而歷史性水域之主張將影響美國之此一權利的行使。台灣應考慮片面宣佈南海行為準則；台灣應大肆渲染由東南沙撤軍換防一事；台灣也應提出前總統李登輝所倡議的設立民間控股公司共同開發南海的提議；最後台灣與菲律賓也應進行重疊海域之漁業合作事宜。

傅崑成教授在評論中指出，同意兩岸關係之處理對台灣之南海政策有大影響，此乃必須接受之事實。但同樣的，中華民國的憲法與法律也是存在的事實，也必須被尊重。南海 U 型線之存在亦然。至於台灣片面宣佈南海行為準則，有何正面好處？台灣自東南沙撤軍，此已是善意之行為表現，但東協或其他國家有何正面之回應？傅崑成教授對瓦倫西亞博士所提將爭議送交國際法院的建議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由於目前台灣不被視為一個國家，無法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他認為向國際海洋法庭提出的機會較大。傅崑成教授基本上同意瓦倫西亞博

士所提共同開發以及與菲律賓進行漁業合作的建議。

在答問期間，台灣綜合研究院龍村倪所長問及日本在南海所扮演之角色問題。瓦倫西亞博士回答，此與日本反海盜與海上維和之構想相關，但受到東協部分國家之反對。賈拉博士隨後舉手發言，首先表示，有關共同開發合作區之提議，他在 1994 年就曾提出所謂「甜甜圈」區域的建議，此區域是在各爭端國兩百海里專屬經濟區之外，但未被接受；1998 年所提出在太平島中、北部的中共、台灣、菲律賓、與越南四方合作區，但中共說再研究看看。此提議仍存在，可繼續推動。至於九條斷續線而言，究竟其性質、其定義為何，此並不清楚，應予以澄清。將爭議送交國際法院對台灣而言的確有困難，但爭端國間之仲裁是可以考慮的。至於日本的角色而言，的確有必要邀請該國參與「南海會議」以了解日本對南海航行安全之關切情形。但中共一向反對區域外國家參與。李勵圖教授發言指出中共的確是反對第三者介入協助解決爭議 (the third party mechanism) 的提議。至於日本參與問題上，或許可考慮將「南海會議」由雅加達轉至東京召開。歐美所林正義所長發言問及瓦倫西亞博士過去所提南海共同開發管局 51% 股份由中共與台灣分享的建議，此想法在 1996 年兩岸關係惡化後，是否有所改變？瓦倫西亞博士並未作正面回答，只是請林所長參閱其所發表之論文細節。至於國際海洋法庭方面，瓦倫西亞博士指出，該法庭是不處理主權問題的。另外，倘若台灣要在南海問題上扮演一個較為有影響力、較重要角色的話，台灣的南海政策有必要調整。最後，傅崑成教授發言指出 U 型線的領土界線性質，以及線內之水域非領海的論點。對仲裁之提議而言，他表示支持。

第五場是圓桌論壇與自由討論，由立法委員張旭成主持，與談人包括總統府資政姚嘉文、國安會秘書處劉湘濱處長、台綜院龍村倪所長、清華大學教授鍾堅，以及政治大學趙國材教授。姚嘉文資政指出，陳水扁新政府仍未對南海政策作出決定；民進黨之南海政策立場也不一定會成為新政府之南海政策立場；民進黨一向主張台灣為一主權獨立國家，因此，南海立場與北京並不一樣，不一定支持南海 U 型線之立場。姚資政指出，宋研究員之報告中未提及民進黨之「台灣憲草」，此憲草指出台灣之領土範圍係包括台、澎、金、馬與台灣所控制之島嶼（東沙與太平島）。基此，民進黨之領土範圍與中共不同。此外，民進黨強調國家安全，南海問題是國家安全問題，因此，南海事務之主管機關應放在總統府之下的國家安全會議，而非內政部。張旭成立委也強調，台灣採溫和的南海政策，有別於中共的政策。國安會秘書處劉湘濱處長隨後報告有關東南沙撤防之政策決定。他指出，前國防部長唐飛之所以在立法院提出東南沙撤軍一事主要是強調巡防署設立之必要。當時立法院正在審議國防法與海岸巡防法。但唐部長在立法院提出東南沙撤軍計畫時，參謀總長與李總統均不知情。事實上，東南沙仍留有少部分軍人駐守，防衛力量也未減少。台綜院龍村倪所長發言中指出南海之重要性，台灣應積極參與南海事務，學者專家應影響政府或智庫去擬定南海政策。他也建議可由

海洋考古著手，進行合作。清華大學鍾堅教授強調南海對台灣外貿、石油進口、戰略等之重要性。一旦對台灣有敵意之國家在南海實施海上封鎖，台灣國家安全將受大影響。中共未來海上軍力將大為增強，對台灣構成威脅。東南沙之換防並不代表防衛島嶼主權力量之絲毫減少，蓋島上仍有部分國軍駐守，只是所穿制服不同而已。政治大學趙國材教授報告指出，他不認為中共會攻打太平島。相反的，台灣與中共在南海有合作的空間；台灣的南海政策因政府之改變也在變；南海問題的國際化台灣是有正面的影響；至於行為準則方面，必須注意它只是一個政治文件，而非法律文件。但台灣被排除簽署中共與東協南海區域行為準則，就不能要求台灣去接受。台灣有抗議的權利。東協應與台灣磋商經濟海域重疊事宜，協助台灣處理與中共爭議；南海問題上與台灣合作是有必要的，畢竟台灣佔領南沙群島之最大島－太平島。瓦倫西亞博士發言表示同意國家安全與他國對台灣實施禁運或封鎖是重要的問題，但台灣繼續在太平島駐軍，以及持續提出南海島嶼主權主張，此與防止中共實施海上封鎖有何關聯？新加坡大學李勵圖教授發言，問及民進黨所主張有關領土範圍是否為台灣所有人民接受？陳水扁總統最近有關兩岸共同歷史與文化之言論對台灣南海島嶼主權主張會有何影響？中共對民進黨有關領土範圍之主張又有何反應？姚資政以台灣人民重視國家安全回答。李勵圖教授再問，學校教科書是否有與南海島嶼主權相關之教導敘述說明？張旭成立委代答，指出教科書上之教導有時與實際情形是不相符的。賈拉博士則好奇問到，似乎台灣學術界與政府在南海政策上有不同看法，而學界比較傾向教條或意識型態之主張，政府卻比較實際。此外，他建議台灣應積極構思一些有創意之提議，舉如共同開發方面，此建設性的做法對強化台灣在南海問題上之處理與角色扮演會有正面作用。至於南海區域行為準則上，台灣應更重視準則之內容而非象徵性的簽署或參與權利。因此，台灣也應就此問題擬定出建設性的做法。赫南德茲教授也持類似看法。宋燕輝研究員發言提出研議以「合作實體」(cooperation entity)方式簽署南海區域行為準則的可能。他也對台灣有關直線基線和歷史性水域主張與國際法相衝突的情形感到憂心。另外，他指出中共與南海島嶼主權爭端國所達成之協議或所發表的聲明對台灣想強化在南海問題上之發言權是不利的發展。林文程教授指出學校教科書的確有提及南海島嶼主權屬我一事，同時再度說明南海對台灣國防安全之重要性。鍾堅教授亦作類似發言。張旭成立委表示台灣是贊成共同開發的。賈拉博士重申 1998 年在南沙中北部四方共同開發之提議，建議台灣應繼續推動此合作計畫。宋燕輝研究員建議第十一屆「南海會議」應將此議題列入。傅崑成教授對南沙中、北部四方共同開發之提議持反對意見，認為南海係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3 條所稱之半封閉海，因此，合作應以整個南海為範圍。賈拉博士解釋，公約第 123 條規定之合作與共同開發是不相同的概念。由於圓桌論壇時間結束，且與會者將前往外交部晚宴，主席宣佈討論結束。

二月五日晚，外交部設宴款待與會國外學者。

二月六日，姚嘉文資政、林正義所長、宋燕輝研究員、李瓊莉副研究員、以及國安會秘書盧政鋒先生陪同四名與會國外學者參訪東沙島。東沙指揮部指揮官熊孝煒上校除作簡報外，並陪同參訪島上設施與防務，其中包括：淡水機房、聰良發電廠、第四據點、碼頭、南海國碑、大王廟、機場等。與會國外學者在簡報與參訪中提出相當多的問題，對此次參訪印象深刻。馬來西亞籍學者翰植博士特別提出馬國在南沙彈丸礁的觀光開發經驗，並與東沙之開發計畫相比。事實上，東沙之發展潛力大於彈丸礁。美國與會學者瓦倫西亞博士則表示此乃他所經歷過最有意思的參訪活動。

二月六日晚，CSCAP 中華民國委員會召集人何思因博士假福華飯店宴請國外與會學者。

二月七日，國外與會學者離台。

三、會議召開成效

此次圓桌會議之召開得到下列三項主要效益：（一）使國內外學者更能瞭解台灣被排除參與東南亞地區安全對話機制與過程，因此，能夠在國際會議、學術場合撰寫比較平衡或支持我立場之文章，進而影響其母國之政策；（二）使國內外學者能集思廣益，提出如何強化我國參與東南亞地區安全對話機制與過程的具體建言，並送政府有關單位做為政策研擬之參考；（三）使國內外學者有機會一訪東沙群島，進而瞭解我政府在東沙群島所作之觀光開發規劃，以及海岸巡防署換防實際情形。除此之外，國內外學者在會中所提出之政策建議，有下列數項值得政府相關單位注意參考：

一、中華民國應向國際社會宣揚我東南沙撤軍換防之善意和平表現；此乃一重要信心建立措施；

二、中華民國應持續積極參與「南海會議」，並作出建設性、有創意之貢獻；

三、中華民國應繼續推動南海地區共同開發之提議；

四、中華民國應研究片面宣布南海行為準則所可能帶來之正面效應；

五、中華民國研究以不同名義（舉如經濟實體、漁業實體、合作實體）達成參與國際組織與會議之外交政策目標；

六、中華民國應研究如何改善兩岸關係；

七、中華民國應採與中共有別之南海政策。

談印尼伊斯蘭的再興： 一位現代主義穆斯林的觀點*

Nurcholish Madjid** 著

林長寬*** 譯

伊斯蘭的復興乃全球性的現象，因此近年來伊斯蘭在印尼逐漸的復興亦勿庸置疑。就某些方面而言，伊斯蘭的再興是穆斯林世界對抗西方文化的自我再認同，也是國際上被西方強權主宰之弱勢穆斯林的再自我肯定，因此伊斯蘭勢力的興起乃出自於自我的保護以去除卑屈的心態。然而問題出在為何是穆斯林而非其他宗教信仰者如：印度教徒、佛教徒、儒教徒等在對抗西方霸權文化呢？雖然其他宗教信仰者也常有一些對抗西方的運動，但穆斯林群體卻常常被冠以「基本教義者」、「狂熱份子」甚至是「恐怖份子」的負面稱號。根據 Huston Smith，部分原因是伊斯蘭比其他宗教較為新，因此其信仰者也是最俱機動能力與積極性。而

* 本文為 2000 年 5 月 6 日於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所主辦之「馬來伊斯蘭政教運動國際研討會」的引言稿。徵得主講人 Nurcholish Madjid 校長同意以中文翻譯稿刊登。主講人 Nurcholish Madjid 校長頗具國際學術地位與政治聲望。歐美學術界已有不少關於他的研究。他的參與討論會使得國內學者有機會與之對話，以瞭解穆斯林學者、思想家之原始觀點。

** Nurcholish Madjid 於 1939 年出生於東爪哇的一個伊斯蘭世家(Santri)。自幼接受傳統的 Pesantren 教育，及長進入雅加達之國立伊斯蘭學院(IAIN)研習傳統伊斯蘭學科取得學士學位(Drs.)。之後，負笈美國芝加哥大學投入當代巴基斯坦之伊斯蘭現代主義大師 Fazul Rahman 門下研習中世紀伊斯蘭政教思想，並以原教旨主義先驅 Ibn Taymiyyah 之思想為題撰寫博士論文並取得學位(Ph.D)。由於在美求學期間受其導師 F. Rahman 影響頗深，遂放棄傳統之 Taqlid 途徑而採 Ijtihad 原則來詮釋伊斯蘭。換言之，其神學立場與早期之 Mu'tazilite 之理性主義無異，標榜伊斯蘭的現代化必須以理性為基礎，這也是十九世紀末埃及現代主義神學家 Muhammad Abduh 所提倡的。在馬來伊斯蘭世界中，Madjid 之學術、政治已有舉足輕重之地位。而國際上他亦被公認為馬來世界最前衛的學者思想家之一。為了致力於印尼的伊斯蘭改革與文化再造，他自己創辦了 Para Madina 大學，並成立出版社宣揚伊斯蘭現代主義，同時亦將西方思潮引進馬來伊斯蘭世界，企圖將早期伊斯蘭之精神、價值觀再現於二十一世紀的馬來伊斯蘭中。Madjid 也提倡宗教容忍與對話以消除印尼的種族文化衝突。除了致力於伊斯蘭學術外，Madjid 也投入印尼的人權運動，他是全印尼人權協會總會主席，並且是 Wahid 政府之首席國策顧問。

*** 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本計畫分支計畫協同主持人。

據 Murad Hoffman 的觀察，對穆斯林傳教士是最困難不可行的，因此伊斯蘭自西元七世紀建立以來，隨著歷史的發展，穆斯林世界一直與西方基督教世界有著不斷的衝突。

通常，穆斯林之所以認為國際事務紛亂無序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伊斯蘭的聖典—古蘭經早已教導他們認定伊斯蘭社群是今世最好的典範，因而它才可主宰了世界有八個世紀之久；即使在西元十二世紀後伊斯蘭文明開始走向衰微，穆斯林社群尚能與其他社群維持等同水準。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西方的現代化與帝國殖民主義之興起。伊斯蘭文明的興起衰微，甚至崩潰可分為三個階段說明之，而以 711 AD，1111 AD，1511AD 為三個主要的轉捩點。(一) 在西元 711 年時穆斯林從中東的阿拉伯半島西向征服了西南歐的伊比利半島(由 Tariq Ibn Ziyad 主導)，向東進駐了印度河谷(由 Muhammad Ibn Qasim 主導)以來的這段時期像徵了伊斯蘭的黃金時期。(二) 四個世紀之後在西元 1111 年(偉大的伊斯蘭思想家 al-Ghazali 歸真之年)以降為衰微期。al- Ghazali 試圖振興伊斯蘭但並沒多大的成功。(三) 西元 1511 年，當麻六甲蘇丹王朝落入葡萄牙人手中時，伊斯蘭世界即進入被宰割的黑暗時代，這意味著西方主宰世界的開始，亦即帝國殖民主義的全球掌控。

從以上的歷史發展分期觀之，伊斯蘭進入印尼生根傳播乃相當近代的事。在爪哇島，伊斯蘭是在西元 1478 年時印度的 Majapahit 王朝滅亡之後才開始鞏固發展，這與麻六甲蘇丹國的滅亡大約同時期。這意味著伊斯蘭在爪哇的發展起於西方殖民勢力進入印尼群島之時。然而印尼穆斯林因忙於應付西方的入侵者而疏忽了致力於伊斯蘭文化的發展上。正因為伊斯蘭乃對抗異教徒的理想武器，印尼地方上的宗教學者與小王國之統治者也因此以伊斯蘭為團結力量聯合起來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基於許多的理由，這些人乃最關心個人自由與他們社群的獨立。

因此，無怪乎那些以宗教學者(又稱之為 Kiyai)為主的穆斯林群體成為殖民者全然歧視的一群。這些穆斯林因為他們對抗殖民者的立場而被完全剝奪教育與經濟發展的權利。這些虔誠的穆斯林形成了所謂的 Santri 階層。他們雖然精通對阿拉伯文與伊斯蘭學術，但卻沒有現代式教育的薰陶。雖然他們被摒除於西方殖民經濟體制之外，但卻自主地發展地方傳統經濟體制。

根據 Soedjatmoko 的理論，在這種情況下這些 Santri 與爪哇島緣文化的發展模式有很大的關連。這種島緣文化是屬於平等、大都會型文化。這種文化促成印尼諸島嶼之間與國際貿易的發展。而這些 Santri 亦正是印尼島緣文化的推動者，因為 Santri 是伊斯蘭虔誠的信仰實踐者。事實上，伊斯蘭乃印尼群島文化與文明同化之推動力，因為伊斯蘭的語言--阿拉伯語為群島文明的同化提供了一個共同認定的指標。早在西元十四世紀時亞齊(Acheh)的蘇丹國就採用阿拉伯語文為官方語言，而爪哇馬來語(Jawi)也因而被阿拉伯化了。因為爪哇馬來語的阿拉伯

化，阿拉伯世界因而通稱馬來世界的穆斯林為爪哇人（Jawi），而阿拉伯化的 Jawi 語文一直保留在馬來西亞、泰國、汶萊、新加坡或菲律賓南部之明達那峨的傳統宗教文化經典中。簡言之，東南亞地區的伊斯蘭化起自於亞齊地區。

因為經濟困境所致，印尼現在正在面臨著一個大危機。但是印尼人對此卻抱持著樂觀的態度，認為印尼並不會因此而分裂。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如同以前的 Jawi 早已成為結合印尼各種族的工具。這種 Bahasa 起源發展自 Riau 地區的方言，事實上它也是一種馬來方言。這種方言透過蘇門達臘西部地區的民納嘎保（Minangkabau）之學者、作家的努力推廣而發展成官方語言。這些學者與作家對馬來語有相當執著並大都受過荷蘭式的現代教育。

由於長期以來中東、印度地區伊斯蘭文明的不斷注入，印尼處處可見到阿拉伯用語及伊斯蘭的影響。因為伊斯蘭的影響相當大而且印尼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穆斯林，若欲談論伊斯蘭在印尼的復興似乎是多餘的，但事實上，從任何角度、立場觀之，的確有其必要性。大多數的穆斯林，尤其是 Santri，都相當愛好個人自由及其社群的獨立。這些 Santri 隨時都準備為宗教文化與國家的獨立而犧牲，例如 Masjid Shuhada（殉教者清真寺）及 Masjid Istiqlal（獨立運動清真寺）碑文所記載的人物、事蹟即是良證。但由於他們受現代教育的權利被剝奪，相對之下，他們亦被排除獨立建國後國家社會發展建設行列之外。這亦說明了為何印尼獨立建國之後仍有一些地方性穆斯林的變亂活動。這種對政府（而非對國家）的不滿情緒一直持續到現在，但這種不滿情緒則隨著穆斯林開始接受新式教育而淡化。

穆斯林接受現代教育起於 1950 年代的 Natsir 政府（1949 年 12 月 27 日共和國成立）。Natsir 總理執政下，其宗教部長 Wahid Hasyim（NU 之成員亦即現任總統 A. Wahid 之父親，他乃傳統伊斯蘭教育出身）及教育部長 Bahder Djohan（他是 Muhammadiyah 之成員）結合了傳統的伊斯蘭經學院與荷蘭現代世俗式教育為印尼的現代教育鋪了路。而這種努力在 1980 年代首見成果，這些穆斯林大學畢業生逐漸在社會國家的發展中發揮作用並扮演重要角色。

因為上述歷史發展的背景，近年來伊斯蘭在印尼的再興比較有戲劇性的變化。那些五十年代所培養的穆斯林大學畢業生乃構成印尼第一批伊斯蘭復興運動的主要成員。他們大都來自政治立場傾向 Masyumi 政黨的家庭背景。Masyumi 政黨曾經遭到蘇卡諾判為非法組織，並被蘇哈托強力地抹黑責難，因為 Masyumi 的政治觀念較注重個人自由、民主與政治平等，這與蘇卡諾和蘇哈托的獨裁政策背道而馳。第二批的伊斯蘭運動成員則來自宗教學者的子弟，他們也是大學畢業生，尤其是 NU 的成員。雖然 NU 曾為蘇卡諾和蘇哈托政權拉攏的對象，但它對二個政府的影響力是微不足道的，在新舊秩序時期則相當被邊緣化，一直到蘇哈托下台才有所轉機。

印尼穆斯林長期以來被壓抑的感受終於在現在的 Reformasi 時代(改革時代)得到宣洩。Reformasi 最重要的成就是個人基本的言論表達、集會自由得到保障。這些自由的取得乃透過一個相當簡捷途徑。這個途徑曾使得某些人不自在,但後來那些人也開始利用這些自由於他們的活動當中來對付敵對者。雖然這些自由權力的體驗是正面的,然而目前社會混亂的污點也正是由這些自由權力不當使用所引起,這也是為實驗自由民主所付出的代價。而毫無疑問的,這種代價的付出也為印尼的伊斯蘭運動塗上些色彩,在很多方面伊斯蘭本質的表達宣示也是前述自由權力的呈現,但是自由表達的粗暴性質亦是因為以前沒有表達權力之後遺症。

目前印尼所面臨最真正且關鍵性的挑戰是如何在往後二十年內持續地推動民主化,以及如何監督政府使得國家避免以前在體驗民主時所犯的錯誤,因為一再地重蹈覆轍終將摧毀自由民主制度的建構。Abdurrahman Wahid 是印尼的新希望,因為他有長遠的眼光願為國家的團結、多元的宗教文化包容性而努力。因為他是曾經被殖民及前二政府排斥的 NU 領導者,他的執政是俱有社會、政治、文化之象徵意義的,這對國家未來的歷史發展有著相當大的影響。Wahid 的執政象徵著幾度被壓抑群體的翻身,也是中下階層虔誠穆斯林追求伊斯蘭精神及其文化體制架構的重建,亦即穆斯林自覺與自決運動的落實。他現在面對著許多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國家經濟的復甦、社會倫理道德的提昇、鼓勵公民社會與民主體制的發展、律法的改革提昇,及社會公義的建立等等。即使面臨相當大的挑戰,但經由各階層人民的參與支持,Wahid 必能履成國家重建的重大任務。

伊斯蘭與印尼華人的同化：存亡繼絕之道*

H. Junus Jahja** 著

鍾凌峰*** 譯 林長寬 校修

東南亞地區的華人大約有兩千五百萬人，其中印尼就擁有六百萬人（約佔全國人口 2.5% — 3%）。在泰國和菲律賓，基本上並沒有棘手的族群問題發生，因為華人被接受為全然（full-fledged）的泰國人和菲律賓人。泰國、菲律賓的華人和原住民之間，無論在社會或政治層面都沒有嚴重的衝突發生。但是在印尼，這種情況顯然完全不同。華人穆斯林至今仍然面對著嚴肅的內政以及爆炸性的「華人問題」。

在殖民時期荷蘭殖民政府透過荷屬東印度公司所制訂的政策，明顯地將不同種族區分為不同階層的公民；因而直接製造出華人與印尼原住民之間的仇恨。荷蘭殖民政府在政策制訂中，加強了華人在工業與商業方面的重要角色。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影響，至今仍然是解決「華人問題」的主要障礙。

* 本文為 2000 年 5 月 6 日於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所主辦之「馬來伊斯蘭政教運動國際研討會」的引言稿。徵得主講人 Junus Jahja 同意以中文翻譯稿刊登。本引言稿內容可提供國內東南亞華人研究的另一個思考方向，亦同時可瞭解印尼華人的另類心聲。換言之，國內學者必須思考的是在學術研究上「華人」與「華僑」不應混為一談。

** H. Junus Jahja（劉泉道）生於 1927 年，曾於荷蘭羅特丹大學（Rotterdam）主修經濟學，是提倡印尼華人「在地化」積極人士之一。劉泉道早期的生涯活動主要是經濟事務，尤其是在銀行界相當有名。1979 年改信伊斯蘭以來致力於印尼華人社群伊斯蘭宣教相關工作不遺餘力。1981 年創立「穆斯林兄弟基金會」（Yayasan Ukhuwah Islamiyah），繼而於 1991 年成立「H. Karim Oei 基金會」，並擔任主席。1980 至 1990 年間曾被聘任為 MUI（Majelis Ulama Indonesia, Council of Indonesian Ulama）顧問委員。1990 年以來亦被延攬至 ICMI（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uslim Intellectuals）顧問委員。1987 他被推舉為 LPMP（Institute of Ethnic Chinese Assimilation in Indonesia）主席。劉泉道也是印尼中央政府「最高諮詢委員會」（Dewan Pertimbangan Agung, Supreme Advisory Council）委員之一（國策顧問），常為總統提出建言。印尼總統在 1998 年頒發給他「Bintang Mahaputera Utama」（Star of the Great Son）徽章的殊榮以肯定他長期以來對國家的貢獻。

***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早在 1945 年 11 月 1 日印尼政府所提出的「政治宣言」，其中陳述著：「……但是我們的政府將執行民主，透過法令讓所有印亞人（Indo-Asians）和印歐人（Indo-Europeans）都成為熱愛國家與民主的印尼公民。」這裡所謂的印亞人，自然指的就是有華人血統的 95% 印亞群（約一千五百萬人）。現在，早已過了半個世紀，那些華人「全然印尼公民」的身份與認同仍然處於未完成狀態。印尼政府對大多數仍然被視為是「外國人」的華裔印尼人，長期以來即施行同化政策。但是儘管許多鼓勵性的改善政策已經有實質的推行，基本上華人仍尚未被完全接受為真正的印尼人。

1979 年 6 月 23 日，本人皈依了伊斯蘭教。在此之前我乃一「名義上」的基督教徒。我的改信獲得穆斯林社群完全的認同、歡迎。甚至其它宗教信仰的朋友，也堅決主張：我必需主動地為那些尚未決定己身宗教信仰的華人提供正確的伊斯蘭資訊管道。針對此反映，我在軍隊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同志--王中海先生（K. Sindhunatha）給了我莫大的支持與鼓勵。我改信伊斯蘭教之後，他在 1979 年出版的一本小書中提道：「...荷蘭人入侵印尼之前，來自於亞洲大陸的移民者在我們群島中努力地尋找一塊有陽光的居地。當他們尋著後，他們顯然即刻同化於當地的社群中。他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無非是因為伊斯蘭的緣故！」王中海先生肯定伊斯蘭，而且將伊斯蘭視為提供華人在宗教信仰選擇時的正確標的。

印尼銷售量最大的伊斯蘭雜誌「Panji Masyarakat」，也針對華人改信伊斯蘭的議題上做了相當完整的分析（1980 年 4 月 15 日）。它提到，改信伊斯蘭教成為穆斯林以及參與印尼的伊斯蘭社群（90% 人口），將使得所有對華人的信用和對國家的忠誠度之懷疑消除，因為「現在他們是我們的一部份！」這種論點在 1980 年 12 月 12 日印尼「伊斯蘭教士協會」（Majelis Ulama Indonesia）得到證實。當時的主席 Hamka 指出：「...印尼華人接受伊斯蘭於日常生活中，是完全地受到人民歡迎的，同化乃因而自動明確地形成。」（Kompas 日報，1980 年 12 月 12 日）

本人因而想起 1988 年 6 月 5 日在雅加達舉行的一場媒體會議，當時雅加達市政府代表 Basofi Sudirman 先生也出席。該會議以朗誦古蘭經開幕；古蘭經的朗誦是由一位年輕的華裔穆斯林大學畢業工程師李興中先生（Surya Madya）所表演。他的確朗誦得很好。Sudirman 先生因而刻骨銘心，並說：「如果在我的故鄉有人攻擊華人，我將讓 Surya 站在我這邊；而且一切衝突也因而消失於平靜。」Sudirman 先生強調華人穆斯林應成為印尼人與華人之間的「橋樑」。但他無法釋疑地提問：「像李興中這樣優秀的華人穆斯林，國家應該如何重用他呢？！」

這二十年以來已經有一群華人皈依伊斯蘭（約三萬至六萬人）。這並非一個可觀的數字，但絕對是個有意義的象徵。以前皈依伊斯蘭的華人大多數是窮人，但現在則是年輕人、知識份子，甚至企業家。華人皈依伊斯蘭的過程，正是同化

之邏輯性結果；換言之，是華人社群與印尼原住民同胞之間互動關係的加強。此乃導致於種族間的通婚，因為 90% 的原住民都是穆斯林，因此有許多華人因為結婚的對象而皈依伊斯蘭。在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年輕人都對伊斯蘭感到好奇，他們想知道其原住民朋友的宗教伊斯蘭為何。這使得他們去探討瞭解伊斯蘭，並進而改信之。

早在幾世紀前的殖民時期，華人已接受到伊斯蘭的宣傳與訊息，但一直是負面的。其中對有關穆斯林至多可娶四妻的法規，而有穆斯林經常結婚和離婚的壞印象。但幸運的是，近十年期間我們的穆斯林社群已有相當的進步成效。現在我們能夠供應更正確且正面的資訊。因此，華人不再隨便盲目地聽從那些虛有的傳言，因為他們可以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親眼看到。事實上，只有極少數的穆斯林有多妻制或有離婚的現象。

過去以來，基督教教會為了吸引華人入教而投下巨大資源。其中較有效的途徑是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教育環境（從幼稚園到大學高水準的教育機構），獎學金和其他財經上的支援。據研究，二次大戰前印尼的基督徒約有五萬人；現在已經高達三百萬人！我們的傳教運動當然無法在這方面與之競爭相比，主要是因為大多數的穆斯林社群並不富裕。但幸運的是，伊斯蘭在印尼也有其他吸引華人之處。伊斯蘭是一個不亞於其它宗教信仰。一旦皈依伊斯蘭之後，華人立即體驗到他們被 90% 的穆斯林同胞的全然接受。基本上，所有過去延續下來的敵對狀態和爭論都因之結束，印尼原住民同胞全然的接納他們，如此可以達到完全融入社群的理想，他們因而終將擁有永恆地「陽光之地」(place in the sun)。這確實是華人長期以來所渴望的。依我的觀察，華人對於伊斯蘭所受到之吸引力的成長幅度是隨著當地改信者在經濟上的改善與進步而增加。

廣州暨南大學鄭仁良先生於 1987 年 10 月 10 日在 Asian Culture (新加坡) 寫了一篇“Approach on Assimilation and Islamisation of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的文章。他預言說：「海外華人將體驗到其傳統文化光環的褪色，他們大中國文化的意識也將逐漸淡薄。在此期間，隨著國家發展將正面地強化華人對印尼文化的認同，而且這種情況將持續發展。」他更進一步陳述：「伊斯蘭是印尼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因此，華人皈依伊斯蘭，跟其他華人在泰國皈依佛教的情況並沒有差別。在歐洲和美國華人也自然的融入當地最主要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文化中。」本人非常贊同這有遠見的論點。

這種理念的呈現與認同，促使我們有必要更進一步將伊斯蘭介紹給印尼華人。本人在 1981 年成立了「穆斯林弟兄基金會」(Yayasan Ukhuwah Islamiyah)。十年之後的 1991 年，許多來自 Muhammadiyah、NU、「伊斯蘭大學校友會」(KAHMI) 和印尼「穆斯林知識份子協會」(ICMI) 的傑出人士與多數華人穆斯林共同創建了「Haji Karim Oei 基金會」。這基金會是以華人穆斯林先驅者

Abdulkarim Oei Tjeng Hien (1905 – 1988) 之名命名。Oei Tjeng Hien 先生是蘇卡諾總統的親密戰友，他有一句名言：「虔誠的華人穆斯林必須熱愛這個國家和本地人民。」(Tempo 週刊，1973 年 2 月 23 日。) 1991 年，我們開始在雅加達中國城的老子街 (Lau Tze Street) 設立「華人伊斯蘭諮詢辦事處」，隨後成為「聚眾禮拜」(al-Juma' Prayer) 和伊斯蘭節日慶典的清真寺。辦事處成立原因始於有些華人詢問關於伊斯蘭的訊息。根據往後的追蹤調查，自此之後就有許多人陸續皈依伊斯蘭。最近，幾乎每天都有華人改信伊斯蘭。之後辦事處大門被漆成華人喜愛的大紅色之後，更多人受到吸引而前來。事實上，根據我的注意，1984 年只有 66 位華人完成了朝聖的義務，現在則已增加到 500 位左右。現今，一般華裔社群中平均就有兩位是穆斯林；近日，甚至有一位大財團的女兒也皈依伊斯蘭。更甚者，有些華人穆斯林宣教士，已經成為印尼很有名氣的人物，並且經常出現在電視銀幕上。為了增加資訊管道提供的需求，我們擴展了我們的服務分部到其它地方如：Bandung、Cirebon、Cilacap、Yogyakarta、Surabaya、Medan 和 Bandar Lampung。

「當你在羅馬時，做羅馬人所做的！」這就是全世界華人在新環境之下所要適應的。在泰國他們皈依佛教，在菲律賓他們皈依天主教，皈依當地草根宗教。而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他們經常是皈依基督教。皈依本土草根宗教，乃取得「陽光之地」的最佳途徑。李光耀曾經提出相關觀點：「同化之障礙並非因為語言和文化，而更重要明顯的是宗教因素使然。」(A. Josey 在其自傳 LKY, 1971) 就印尼的情況而言，眾所皆知，原住民和其他外來移民同胞間過去的仇恨感還持續著。因此，華人在日常生活中時常被視為障礙物，遂造成印尼華人有所謂的「身份危機」(identity-crisis) 意識。在尋求省事的解決之道時，常常會掩蓋或否認他們的種族背景。華人在改信伊斯蘭的過程中，族群來源並非問題，因為伊斯蘭標榜：穆斯林四海皆兄弟，因此種族認同不應刻意去迴避，「你就是你自己」(You are what you are)，所以一切「身份危機」也都將隨之消失。以我本人為例，在很多場合，若有人只因為我的「華人身份」而懷疑我時，答案其實得很簡單：「確實如此，我就是華人，那又如何呢？」在此情況下，穆斯林社區即刻給予我最大的支持，誠如前印尼「伊斯蘭教教士協會」(MUI) 主席 K. H. Hasan Basri 在 1991 年時所說的：「從皈依伊斯蘭的那一刻開始，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間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也沒有華人與否的問題。我們的家大門，永遠都為著我們的兄弟而敞開！」事實上，這種保障是許多人所迫切渴望的。

我們在中國城的清真寺可謂是相當有意義的。我們接受過許多著名團體與傑出人士到訪。因此我認為，我們有必要讓國外各種媒體注意到我們的地方與活動。伊斯蘭在印尼華人圈的傳播是相當特殊的現象。如果成功，這對印尼國家將造成很大的影響。就此言之，Charles A. Coppel 在其“Indonesia Chinese in Crisis” (1983) 文章中提到：「以伊斯蘭作為新的替代方式來解決印尼的華人問題途徑

已產生。但是許多穆斯林團體，經常懷疑伊斯蘭是否能獲得東南亞地區兩千五百萬華人的認同與信仰。我們必須意識到華人的經濟力量相當龐大可觀，它可以成為伊斯蘭傳播的重大資源。然而，對華人宣揚伊斯蘭並非易事，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因此，國際穆斯林社群是否可能來承擔此一重任呢？

印尼伊斯蘭現代調適之途徑： 一個 ICMI 之理念*

Muhammad 'Imaduddin 'Abdulrahim** 著

邱炫元*** 譯 林長寬 校修

若與其他地區相較之下，伊斯蘭進入印尼的歷史是相當獨特的，可能唯有喀什米爾（Kashmir）可與之相比擬。不同於伊斯蘭進入埃及、土耳其、印度、南歐和地中海地區是透過宰制性的政治入侵，伊斯蘭在馬來世界的傳播乃藉由文化交融而擴散。伊斯蘭主要經由穆斯林商人以貿易帶入印尼群島，外來穆斯林商人與當地馬來人在經貿互動的過程中產生文化相融而使得伊斯蘭得以在地化並傳播開來。在伊斯蘭進入馬來世界之前，早在公元一世紀時，印度教和佛教已在馬來世界生根發展。伊斯蘭建立之前六百年期間的馬來世界可謂印度教、佛教文明的邊緣區。而在印度教、佛教進入之前，馬來群島居民的宗教信仰屬於泛靈崇拜（Animism）。由穆斯林商人傳入的伊斯蘭信仰幾乎未經抗拒地被原住民所接受之主要原因是那些穆斯林商人本身對非伊斯蘭信仰的妥協性格。因此伊斯蘭是以一種相互尊重的態度來對原住民傳教，所以印尼伊斯蘭的發展之初就具有融合

*本文為 2000 年 5 月 6 日於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所主辦之「馬來伊斯蘭政教運動國際研討會」的引言稿。今徵得主講人 Abdulrahim 教授同意以中文翻譯稿刊出。主講人 Abdulrahim 教授為馬來伊斯蘭世界頗具國際政治聲望與地位。歐美學術界已有不少關於他的研究。他的參與討論會提供了國內學者與之直接對話之機會，以便更能瞭解穆斯林學者當事者之思想。Abdulrahim 教授的觀點可謂反映當前印尼政府伊斯蘭宗教文化的政策走向。

** Muhammad 'Imaduddin 'Abdulrahim 於 1931 年出生於知名的宗教世家(Santri)，其父為印尼著名宗教學者。Abdulrahim 自幼接受其父之伊斯蘭啟蒙教育，並能背誦全部古蘭經。之後進入大學攻讀機械工程學位，後期往美國於同領域深造取得博士學位。Abdulrahim 留學歸國後即從事大學教學工作，並在校園內提倡伊斯蘭教育工作。Abdulrahim 自大學時代即投入穆斯林學生運動。他是 ICMI 重要創立成員之一，曾經是 MASYUMI 前鋒成員，也是「真主黨」(Hizbullah)的戰將之一。1988 從大學教職退休之後更積極的投入伊斯蘭復興運動。他也投入印尼人權運動，與一些同道創立了 YAASIN(Yayasan Pembuna Sari Insan--Jakarta)並任主席至今。目前除了被 ICMI 聘為首席顧問外，亦是 Wahid 總統之國策顧問。

*** 現於荷蘭萊登大學 ISIM 中心攻讀印尼伊斯蘭 M.Phil 學位。

(Syncretism) 的特色。爾後的發展才更進一步的強調中土伊斯蘭文化。

馬來世界伊斯蘭的發展在西方的殖民者進入該地區之後及受到嚴重的扭曲。入侵印尼的西方殖民者前後有西班牙、葡萄牙、英國、荷蘭。這些歐洲殖民者他們在其對外貿易、政治擴張之初早與伊斯蘭世界有過交手，而有痛苦的經驗，特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西元 715 年至 1495 年間被穆斯林統治近七世紀之久。

荷蘭殖民印尼地區遠較其他強權為久。當荷蘭企圖要征服印尼諸島時屢遭遇到抗爭的困難，尤其是在一些伊斯蘭文化已經深植的地區像是爪哇島的 Banten、蘇拉威西 (Sulawesi) 和亞齊 (Aceh)。在亞齊地區荷蘭的殖民統治經常面對當地穆斯林最頑強的抵抗，因為亞齊地區人民擁有虔誠的伊斯蘭信仰之堅拒抵抗非伊斯蘭的殖民勢力而捍衛他們所謂的「伊斯蘭淨土」(Dar al-Islam)。歷史記載所謂的亞齊條約 (Aceh Traktaat) 一直到 1908 年在荷蘭威逼之下完成簽訂的，在這之前亞齊地區經常有大大小小反殖民的抗爭運動。此地區的抗爭運動在 1930 年代以前一直由宗教學者與知識份子所領導，其中最著名的英雄人物是 Pangeran Diponegoro Panotogomo 和 Kiyai Mojo。

亞齊人對荷蘭殖民政府之抗爭運動所造成的痛苦經驗使得殖民當局不得不派遣其學者官員 Snouck Hurgronge 到埃及學習阿拉伯語文與伊斯蘭。之後，Snouck Hurgronge 又混跡於麥加之馬來穆斯林遊學生(Jawi)社群中以挖掘印尼穆斯林強韌抗爭性格之源由，如此以探求消除反殖民之道。Hurgronge 自麥加歸來後即提出一個“Etische Politiek”的教育理念來降低印尼土著與殖民者之間的對立。在 1925 年此一概念提出執行後，穆斯林的抗爭被削弱不少，因為這個政策理論的本質將「政教分離」之觀念強加諸於穆斯林上，提倡只教導印尼人技術知識以作為殖民者的統治管理工具，進而提昇青年人為殖民者服務的水準，但對於行政與管理知識的訓練則付之闕如。在宗教教育方面，印尼人雖然被賦予自由來學習與實行伊斯蘭教義；但宗教不得與社會、政治、經濟事務相結合。換言之，伊斯蘭被侷限於個人的信仰。當此一政策頒行之後，被派駐到巴達維亞(雅加達)的總督必須是精通伊斯蘭文化的專家，要能通曉阿拉伯文，這些行政主管必須與宗教學校主管混居以達嚴格監控執行政教分離政策。這種安排同時意味總督同時兼具穆斯林宗教學校主管的角色，對學校的教務遂行嚴格的控制。在二次大戰日本擊敗印尼荷蘭殖民政府之前最後一任總督 Van Der Plas，本身即為一位伊斯蘭學者，他曾經查禁過某些被認為具有鼓動獨立意圖之嫌的書籍。例如，埃及現代主義思想家 Muhammad Abduh 的古蘭經詮釋就不被允許在宗教學校使用。此外，有關伊斯蘭改革的書籍亦在被查禁之列，因為這些書籍被認定會危及荷蘭的殖民統治。

在宗教思想管制政策之外，宗教學者(Ulama)與被認為是「立憲政府」(譯

按：殖民政府）潛在敵人的子弟一律被排除於最好的荷蘭學校如：HIS、MULO、AMS、HBS，更遑論及大學。荷蘭殖民政府力圖以這種“Etische Politiek”政策保住其在印尼的殖民勢力現象其實不難瞭解，因為真主早就在古蘭經中提到：

「的確，他們（敵人）早已策劃其陰謀。即使他們的陰謀能夠移山（倒海），卻仍在阿拉的監視之下。」（Q14: 46）

「那時，他們（不信阿拉者）正在陰謀策劃著，而阿拉也在策劃；而阿拉確是最好的策劃者。」（Q3: 54）

真主已經在印尼人民之中孕育許多在殖民地時期被認為是精通科技的天才以及宗教學者和睿智的統治者，並且鼓勵這些人才挺身捍衛他們惡劣的殖民勢力所逼迫的國家和宗教。這些傑出的人才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Haji Agus Salim。他被迫只能在家自學，而無法進入設備先進的荷蘭學校接受教育。但是他卻自修成功並以耀眼的成績通過國家考試。他隨之致力於穆斯林青年之教育大業以訓練他們成為國家的菁英。這些人在 1945 至 1950 年間印尼的獨立運動扮演相當重要角色。無可否認的，印尼獨立運動的成功建立於「以阿拉之道奮戰」(Jihad fi Sabil Allah)的精神上。歷史顯示，爪哇各地的宗教學者在 1945 年 11 月 10 日聚集造訪 Surabaya，制定了所謂的「英雄日」響應他們的領導人 Bung Tomo 所喊的口號——「真主是至高至大者」(Allahu Akbar)。在其他的地區，全國的真主黨(Hizbullah)串聯起來擊潰企圖重返印尼延續殖民的荷蘭軍隊。伊斯蘭精神對抗西方殖民的明證可由亞齊「圓桌會議」之勝利得知。當 Bung Karno 在日惹(Yogyakarta)敗於殖民軍隊而被放逐到蘇門答臘(Sumatra)的 Berastagi 時，遂與亞齊的真主黨員結合。亞齊可謂全印尼獨立運動之中心。亞齊穆斯林素以執著於伊斯蘭的信仰著稱。該地區被稱為「伊斯蘭聖劍之地」(The Land of Soward)。當地人以其地為馬來世界進任麥加聖地之門戶為傲。

當印尼獨立建國時，印尼穆斯林當中並無足夠的行政人才，因為在殖民時期穆斯林接受教育的機會並不多。因此，獨立後的印尼共和國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機會給人民，讓穆斯林子弟有更多的機會進入優質的學校。然而，正因為缺乏足夠行政人才的因素和欠缺管理的經驗，穆斯林在競爭上仍然處於不利的地位。因此在第一期國家發展計劃(The First Development Plan)推展之際，穆斯林在這個提昇印尼國人生活品質的計劃裡只扮演微不足道之角色。但是隨著對「真主的獨一性」(the Oneness of God)的精神充分體認及其引領下，一部份的穆斯林子弟在國內外的大學接受更高級專業的教育。自八〇年代起穆斯林已經開始享受辛苦犧牲的成果。

在 1980 年代，穆斯林帶著高昂的期待整合團體組織以致力於國家發展建設。無疑地，1990 年的 12 月 7 日，這個日期乃是印尼穆斯林覺醒追求美好遠景

之始。穆斯林知識份子於該日為落實長久以來追求信仰真諦的理想而創立了印尼穆斯林知識份子協會 ICMI (Ikatan Cendekiawan Muslim Se-Indonesia, 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uslim Intellectuals) 團體形成一個已被那些為自己的信仰追求奉獻的穆斯林所久盼的結盟。此協會形成的主要宗旨在於提昇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與虔誠 (Faith and Piety)、思想、工作和生活的品質。這個宗旨承繼在殖民時期受到壓制之宗教、知識份子的理念。其理念則在於發揚伊斯蘭之宗教、文化、倫理道德之價值觀。為了此一宗教、文化理想，ICMI 的種種活動往往被那些將置個人私利於國家整體安全與福祉之上的人所反對。或許 ICMI 的成立時間較遲些，但從一開始它已經激發所有成員的意志努力地來實現他們的期望。ICMI 的歷任主席已經和幾個與伊斯蘭院校簽訂合作協定，致力於提昇科學、技術與伊斯蘭之虔信。所有 ICMI 具高能力的成員，不是奉獻他們的知識，就是投入金錢來推展其具永恆價值的目標。ICMI 在印尼全國各地，為提昇伊斯蘭學校的教師之科技知識水準而定期地提供相關之訓練課程。除此之外，在每個校園之中，對於修習科技領域的學生，也提供短期和密集的伊斯蘭課程，甚至對在國外留學之印尼穆斯林學生亦提供宗教修養之課程。

我們必需瞭解的是，在殖民勢力進入印尼之後，伊斯蘭教育並未能達成其應有之目標。因而造成穆斯林之文化素質與宗教修養良莠不齊。結果，感情上穆斯林對宗教信仰有所許諾 (emotional commitment) 與堅定執著，但是在理智上對於宗教的篤信 (intellectual commitment) 卻相當薄弱貧瘠。因此，正確理性地瞭解伊斯蘭與提昇信仰虔誠性乃所有印尼穆斯林之首要目標。

至於欲在伊斯蘭的傳教工作中扮演更積極主動角色者，應當銘記在心的是，整體社群利益的考量應當朝向伊斯蘭信仰的本質，並回答三個 W 問題：「什麼」(what)、「為何」(why) 要關切伊斯蘭，尤其是更要回答「如何」(how) 關切伊斯蘭之相關問題。因為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大，因此傳教時必須考慮到社會變遷的問題，以及若干尚未被宗教學者、知識份子所完全認同的觀念與做法。換言之，有關如何實現提昇信仰的實質問題唯有在一些基本問題被釐清之後才能被提出。

伊斯蘭信仰的本質相當強調“Tauhid Uluhiyah”(神獨一論)，此一觀念乃來自獨一神阿拉的天啟與先知穆罕默德的教義，這在古蘭經與聖訓當中有著相當清楚的闡釋。我們必須認清今日印尼學者所教導的伊斯蘭基本教義則是“Tauhid Rububiyah”(萬有一元論)，此一概念最先由 Abu Hassan al-Asy'ari 從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的邏輯理論所推演出來的。隨著個理論的發展，穆斯林對於積極的“Taqdir”理論 (神前定論) 的理解逐漸轉變成傾向消極的“Fatalism”(宿命論)。“Fatalism”這個觀念所造成的影響誠如 Narun Nasution 教授所言，大多數的穆斯林因而對於學習技術與發展科學抱持消極被動的態度。Asy'ariyah 的哲學已經被 Ibnu Taimiyah (661H./1263M.—726H./1328M.) 所批評。但是我們許多學者還是不瞭解 Ibnu Taimiyah 的學說，因此 Ibnu Taimiyah 的理論著作在印尼並未十分為

人所熟稔。Nurcholish Madjid 或許是第一位印尼學者針對 Ibnu Taimiyah 的理論進行深入研究並以此寫就博士論文者。遺憾的是，並非有許多印尼學者願意閱讀他的論文。

為了要證明真主的存在，al-Asy'ari 宣稱時間的循環(Dawr)是不可能的，認為時間是永恆的。這樣的解釋導致印尼學者以「時間是恆互不變」的原則去理解古蘭經之天啟，甚至對於真主的存在也用同樣的觀念去解釋，例如古蘭經第 57 章第 22 與 23 節。對於 Asy'ari 時間永恆的觀念，Ibnu Taimiyah 批評其為「受時間所束縛」(Dahriyah, time-bound)。

此外，al-Asy'ari 也認為“Tasalsul”是不可行的，所以他提出否定「無限性」(Infinity)的理論。這個 Infinity 理論在技術和科學領域中乃常見的一個概念，而古蘭經中對於「無限性」已有相當清楚的解釋，如第 18 章第 109 節與第 31 章第 27 節。al-Asy'ari 之理論對於古蘭經第 57 章第 22 節的解釋形成穆斯林被誤導而使得宿命，對世事容易滿足而將地球之一切運作歸因於命運，同時也喪失了自信心。因此，為了造就新世代接受全球化的挑戰，印尼的伊斯蘭教育極需改正錯誤的觀念。用廣義所認定的「奮鬥」(jihad, struggle) 精神也必須反映在伊斯蘭的教育中，以更深刻地呼應先知的訓義。“Tauhid Uluhiyah”所強調的「除真主之外無他神存在」(“no divinity beside God”) 的精神也應該在各種體制內與體制外的伊斯蘭教育中推廣。

就伊斯蘭教義而言，其所標榜之精神本質將更能促進技術與科學之學習與落實真理之實行。經由“Tauhid Uluhiyah”之理論所形塑的態度，認為自然界整體(the whole of nature) 乃真主所創造來作為人類奉獻服務神的工具。唯一真主創造的人類應犧牲奉獻於真主；而主要的奉獻形式則是要在大地上造就更多豐盛的事物。如古蘭經所提：

「...祂從大地造化了你們，並使你們安居在那裡...」(11: 16)

「祂也使大地諸天一切都服從你們，這些全都來自祂。…」(45: 13)

科學與技術在無知的舊世代中發展之所以遲滯，是因為他們認為人類的力量不如自然的力量。就像古希臘人奉祀奧林匹斯山 (Mt Olympus)；東爪哇 Tengger 的人們奉祀 Bromo 山，古義大利人祭拜 Vesuvius 山，或是像在印尼某些人認為榕樹具有神聖性而祭拜之。伊斯蘭的本質乃在匡正此一泛靈崇拜觀念，置人類於造化地位而來崇拜唯一的造物者。在古蘭經之第 6 章第 75 至 79 節先知亞伯拉罕 (Prophet Abraham) 的省思即充分說明了此一本質。

古蘭經中所記載亞伯拉罕的體驗，解釋了人類對於自然界理解一個重要的發展過程。從科學的角度來說，我們不能否認人類的生活依賴太陽、月亮、星星這

些天體，因為氣候、季節、潮汐乃是受到地球和這些天體之間的相對位置而決定，並且影響人類至鉅，但是所有自然的力量都是相對的。人類對於這些天體過度的依賴將會降低他們的地位，因而使人類不敢運用這些天體。真主在古蘭經當中的許多經文的明示，如第 6 章第 75 至 79 節經文顯示穆斯林應瞭解並且妥適地運用自然，並善用自然整體的力量來奉獻於獨一的創造者。

假如這種心態是正確的，那麼古蘭經精神的教誨將使下一代的穆斯林更熱中於學習科學和技術，但是這種學習的態度不是要以西方那種世俗的貪婪來主宰自然。中世紀時，西方從伊斯蘭學得理性思考方式，而將宗教教義與現實生活區分開來，因而產生了文藝復興運動。然而關於神的本質與宗教精神卻因之蕩然無存。科技在西方已經喪失其精神本質而成為僅是攫取世俗物質的工具。結果，科學和技術導致了威脅全人類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環境的破壞。至今這些種種科技所帶來的後遺症尚無法完全地消弭。

此刻，印尼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社群，要肩負起讓科技的發展回歸其精神本質之重任，並且重新以回歸古蘭經的精神與為了我們的地球而奉獻於真主的宗旨來發展科技，而不要去摧毀這個曾經是物種繁茂的星球。因此二十一世紀當代穆斯林知識份子所扮演的角色遠比在 Ibn Sina 和 al-Farabi 時代推動科技的前瞻者更為繁重。除了要彌補因為殖民時代所耽誤的差距，二十一世紀穆斯林知識份子的角色是在推動高科技的發展，並且同時讓科技的發展回歸至以真主的本質以及奉獻真主的普世基礎（universal basis）上。所以印尼現在所推動的政策是要讓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社群晉升而直接地掌握高科技。為了伊斯蘭以及印尼國家民族的延續，在沒有其他的選擇之下，應對這個構想投入所有的資金與力量去推動。

因而在新世代成長的初期就應將古蘭經的精神傳授給他們，引發他們心中的好奇心去認識到真主所希望每個穆斯林都能對祂應有的更深瞭解，真主也將引領新世代進入在古蘭經中所描述的境界：

「他們並非是可被貿易或商品所誘惑而不對阿拉紀念、守禮拜、納天課的人。他們畏懼使他們心神與視力顛倒的日子...」(24: 37)

就伊斯蘭順服之基本大義（aslama）而言，亦即，為了全然順服於真主的意志，這個世界自身乃是最完美的伊斯蘭模式。為了更能瞭解真主的道理而更如其所如地遵循祂，有超過百分之十五的古蘭經文鼓勵人們研究和探索自然的本質；以便瞭解真主所制訂的自然規則之運作，進而激發人類對神的思考與探索。因為古蘭經非常鼓勵科學研究和瞭解自然的法則，所以人類應當運用他們的研究以奉獻於真主。人類乃因為如此之使命而被創造以實現真主加諸於他們肩上的重任來照顧這個地球。瞭解真主創造自然的律法是必要的，因為那不但幫助人類實現目標，使人類能更虔誠地自身奉獻於這造物主，並且也幫助人類善用此一律法完成

他們的職責來看顧地球。為了這個理由，真主所賜予人類最基本的科學思考的潛能。而古蘭經第2章第31至34節亦有明示。

根據古蘭經第2章第31至34節之經文，人類的地位乃在天使之上。真主命今天使向亞當行禮是因為亞當瞭解萬物的性質，也就是科學。除此之外，前面曾述及，古蘭經中有百分之十五的經文鼓勵並且要求人類去探索研究天地。如果我們肯定古蘭經文的傳達者先知穆罕默德乃最後一位為了現代人類設想的先知，那麼穆聖就是科學與技術的前導者。當我們瞭解真主鼓勵人類研究科學，這將鼓舞人類奉獻於真主，以及創造一個使人類可以盡最大的努力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條件，來保存和提昇地球的生命之原（the cause of life）。歷史已顯示真主的律法是真實的，只要穆斯林堅定對於古蘭經的信仰，那麼這個人類被賦予的能力就會持續下去。當穆斯林在科技的發展上退步，而無法掌握世界，顯示他們忽略古蘭經當中所言：

「先知將會說：『我的主阿！我的族人確實曾經視古蘭經一文不值。』」（25: 30）

印尼穆斯林社群的領導者在二十世紀之初印證了歷史事實，他們也發展教育讓人們更能瞭解古蘭經。「回歸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Return to the Qur'an and Sunnah of the Prophet”）已經成為印尼獨立運動的口號。當人們即將要實現當初領導者及學者們獨立運動的目標之時，每個穆斯林知識份子，都應該推動他們的志業來完成其前輩所交付的使命，並且堅信如此被肯定的神聖職責而完成它。

但是在實現這個志業的過程中，應當要了解奉獻於真主的態度和心志唯有在個人的內在自我（inner self）經由伊斯蘭普遍價值的密集教育才能得以落實。所以伊斯蘭教育理應成為一種知識活動（intellectual activity），使每位穆斯林在接受教育的初期都應對此有充分和全盤的瞭解。因此穆斯林被責付開創一個能有效以達成此一目標的教育計劃。

伊斯蘭強調人類是唯一真主的創造物中被賦予機會承擔管理世界的責任。因此，身為「管理世界者」（planet manager），人類被賦予自由選擇和決定未來的方向，不過這一切的決定和最為都將由真主來審斷。人類必須要考量這個世界的條件和狀況因為在隨後的審判日（Day of Reckoning）（Q. 17:36）他們之前的所作所為亦將面臨考驗。身為穆罕默德的追隨者（People of Muhammad），當最後的先知為人類帶來此一完美的宗教，穆斯林應該瞭解到他們具有為全人類擔任傳達者與見證者的責任（Q. 2:143）。穆斯林將無法承擔這個沉重和神聖的責任，除非他們能展現他們是具有高貴品德者，而這種品德是源自他們奉獻於至慈真主的特質如：以開創、睿智、真誠、熟練和最篤信虔誠的心來面對真主。對領導者

而言，這些特質是相當基本的，而且也應當積極鼓舞年輕穆斯林領導者去培養這些特質，所以穆罕默德的追隨者變成為真主在古蘭經中所明示的“Ulul albaab”(Men of understanding) (Q.3:190-191)。

每個穆斯林解決問題的態度和決心都應該遵循古蘭經的教誨：世界萬物皆由至慈的真主（the Lord of Grace）為著人類好處設想所創造（Q.2:29;45:12-13），所以人類被責付以善用真主的恩澤為著全人類的福祉在這世界上發展創造榮景（Q.11:61）。建設國家的事業正是來自真主為穆聖的追隨者所著想的神聖託付。此一重責大任應當透過組織來凝聚眾人的努力，像是 ICMI 和其他的伊斯蘭群眾組織，運用有效和樂觀進取得方式來達成。

因為時代的挑戰是如此繁雜以振奮人心，所以我們必須將發展人力素質置於首要目標。只有人力素質的提昇方能訓練出更多穆斯林運用整體的古蘭經精神直接致力於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我們亟需給予具有科學天賦的年輕人獎學金，讓他們能夠在國內外最好的大學接受教育。當這些人畢業後，能夠齊聚在設備優良的科學與技術研發機構，在所有的科學領域進行尖端科技的研究。這些科學技術人才必須接受特別而密集的古蘭經教育，使其通曉古蘭經的精神。提昇和發展穆斯林素質的問題刻不容忽延緩，應把它擺在最優先的目標。

因為我們已瞭解尚有一些印尼民眾的處境和態度依然受到萬物有靈信仰的聖跡（relics of animism）崇拜和混雜的宗教（syncretism）觀念的影響而對自然遲疑和放棄探求世界，因此必需經由有效的古蘭經教育，來讓他們瞭解真主是為著人類的最佳利益創造自然。當覺察到印尼人仍然對於學習和瞭解古蘭經抱持退卻的想法，每個 ICMI 的成員應該肩負責任奉獻最大的心力，立基在教育法的基礎上尤其是伊斯蘭教育，參與促進國民教育來提昇並改進公眾的智識活動。大多數民眾宿命的態度，應當可經由以立基於古蘭經與先知的典範的伊斯蘭精神為依歸的教育而有所變革。因此，民眾們對於命運的逆來順受以及對於現存處境未經反思地延續，應該可以經由強調增強自信的教育來匡正，民眾經由教育所增強的自信，需要每個人以提昇生活、呼應古蘭經精神的清澈思維和有益的行為作為目標，善用他們自身的能力，努力來改善他們的處境。換言之，遵循兩個真主的律法，其一是顯明的律法，就如古蘭經中的啟示；其二則是不顯明的律法，即存在於自然界的運行。

在鄉村的蘇非菲密契主義對於伊斯蘭信仰的誤導，可以藉由教育的途徑引領這些人到以正信為基礎的正確道德行為，因此蘇菲神秘主義的負面與消極信仰態度可以轉變為對於世界抱持樂觀和進取的態度，而不至於忽略來世的觀念：

「你要以阿拉賜給你的去尋求後世的家，也不要忘記你在今世的那一份責任。你要對人行善就像阿拉善待你一樣，不要在世上為非作歹。」

的確阿拉不喜歡為非作歹的人。」(Q. 28: 77)

當某些穆斯林他們面臨一般生活的困難而退縮時，像這樣的情形應可經由強調自信的教育來消除。這種自信乃是一種對於真主感恩心情的彰顯，因為祂已經告訴我們祂將人類創造為最完美的型態(Q.23:14; 95:4)，更遑論是心智和靈性的能力(Q.17: 70)。

隨著 ICMI 獻身於致力提昇導向完整信仰的伊斯蘭教育，我們可以期許印尼穆斯林對於科技術的發展應該可以有更好的掌握，並且繼續發揚開國英雄和元勳們的精神加強建設與指引印尼。穆斯林應設立一有整合課程的教育機構。這些課程必須融入古蘭經之教義及注重科學教育的精神，亦即如何求知的態度。假如宗教中小學和寄宿學校也同時朝此一目標提昇，並拓展至國家的標準課程，那麼提高科學與技術教育水準的改革方案便可以更有成效。ICMI 協同其他的伊斯蘭團體如 Muhammadiyah、NU、Attahiriyah、PERTI，以及其他等團體必須同心協力，立即在他們的日常活動中來實現這個目標。

就此，印尼的每一個省份至少都應設立一個專責的教育機構作為實驗性的計劃來作為整合伊斯蘭與科技教學體系。若是這個實驗性的計劃能夠發展出整合性的伊斯蘭教育，那麼穆斯林便可以要求政府透過立法在這各階段的教育推行伊斯蘭教育並使之實施於全國。所有的師範院校和私立伊斯蘭學院應該配合此一計劃試行來找出最佳的整合措施。對古蘭經的充分理解乃是這個整合性的教育計劃的核心。對於印尼文和阿拉伯文的掌握；以及對於數學、科學和藝術的瞭解都與培養認識古蘭經的能力有關，特別是音樂、美術、戲劇皆應成為基礎的學養。因此，穆斯林兒童邏輯和心智能力的養成也應具備古蘭經的基礎和包括語言、數學與藝術三個領域的統合性教育。隨著基礎教育的強化，穆斯林的兒童必能經由不同階段知識的學習來增進他們對古蘭經的瞭解，隨之而使他們成長而成為具有創造革新能力，並發現他們所處的世界之知識已經揭示在古蘭經之中，而他們也從這個體會獲得更穩固的基本道德觀(Q.3:190-191)。

「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博士論文簡介

呂秋遠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本計畫八十九年度博士論文獎助得獎人

本論文以 1997 年的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與其在此區域的後續影響為出發點，希望能解決長久以來國家干預對於經濟發展的爭論。目前探討金融危機的理論大致上可分為制度途徑（金融體制理論、民主化理論）、景氣循環理論、國際因素（骨牌效應理論、西方陰謀論、依賴理論）與文化途徑。從民主化理論來看，日本、南韓與俄羅斯乃屬民主政權，卻受陷於金融危機中，不能自拔；中國屬於低度民主國家、印尼已完成第一次政權移轉，但遭遇卻又有天壤之別：印尼經濟衰退已經影響政權穩定，中國則以區域經濟穩定力量繼續保持人民幣的強勢地位。由此我們獲得檢證，民主能否維持經濟成長於不衰，僅僅是一項迷思。其次是景氣循環理論，如前所言，景氣循環的週期在每個國家都不相同，是什麼原因讓東亞、俄羅斯與北亞同時朝向衰退期？退一步說，即便我們可以找到相同之處，對於金融危機的發生與解決似乎也無力探討與解決，如果必然發生，也必然恢復，經濟學者就不需焦頭爛額的尋求解答，很顯然的，我們也無法以景氣循環理論來觀察金融危機。就骨牌效應理論來說，即便其他所有國家都是因為泰國的貨幣狂貶而導致本國的金融危機，那麼，泰國的金融危機來自於何種原因？骨牌效應的最大缺陷也在此，它無法解釋第一張骨牌為何被推倒。

而西方陰謀論的問題則是在於，如果重商主義是導致東亞高度發展的原因，重商主義又如何成為金融危機的原凶？也就是經濟干預政策何以同時成就東亞並毀滅東亞？這一點可能需要進一步的推論才能證實，否則重商主義與西方陰謀論都無法解釋金融危機的始末。依賴發展的狀況是普遍出現在幾個東南亞國家的，包括國民所得分配不合理、引進資本密集而非勞動密集產業、扭曲當地勞工

市場並且穩定當地獨裁政權等都是這些國家的問題，但是我們同時發現，納入世界經濟體系或是採取經濟孤立主義其實都不能保障經濟發展。前者固然會將國家束縛在出口導向的迷思與外資操縱市場的問題之中；但經濟孤立同時也會造成大量資源配置失當與經濟效率低下，妨礙經濟的長期發展。因此，就經濟整體發展來看，依賴理論似乎也不是解釋金融危機的依據。最後，我們試圖爬梳文化理論的看法。至少就目前來看，由於東亞區域的文化不一致，文化因素可能比較難以解釋整個東亞地區的經濟停滯，當然，更別提俄羅斯。在文化因素的內涵中，不論種族、宗教、語言與風俗等都不相同，如果希望解釋東亞金融危機的成因與解決之道，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發展。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上述途徑都有無法解釋金融危機之處，似乎只有制度途徑之中的金融體系論才能解釋本次的東亞金融危機。但我們同時發現，只有談到金融體制論，似乎還是不足以說明現象發生的真正原因。因為金融體制良莠的決定因素其實在於政治體制，如果我們希望能夠避免重蹈覆轍，最好的方式應該是找出背後政治運作的邏輯。我們認為，或許應該嘗試以新制度論的角度介入探討，以期能真正找出金融危機的原因。本文透過國家干預與經濟發展間的運作模式來觀察所謂的「亞洲奇蹟」為何會出現，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為何肆虐。本論文認為，當國家面臨經濟發展的問題之際，不能單面向以新古典主義或是新重商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而是應該回歸新制度論的假設，以探討當不同環境變動時，國家應該採取何種制度以應對之。在百廢待舉時，採行干預政策可能是正確的，但當整體經濟環境已經趨於成熟，政府可能只能固守矯正市場失靈的位置。

整個亞洲，特別是東亞的情形截然不同，發展的程度與時期也都不一致，但是透過我們的模型，我們發現東亞從 1970 年發展初期，截至 1997 年為止，都一貫採取國家干預的手段，因而當國際投資環境驟變之後，無法因應新情勢。我們在第二章之中，我們對於金融危機的起源提出架構模型，希望能找出金融危機的原因，進而提供政治層面在金融危機所能提供的解決之道。我們認為，國家對於金融體制有絕對的影響力，當國家在發展初期，必須介入金融市場以維護本國產業制度與金融體系；但當經濟成長到一定程度時，國家就不應該再以各種手段干預市場，例如泰國保護本國銀行或是南韓強迫各銀行進行政策性貸款。換言之，政府的干預程度必須隨經濟成長遞減。本次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來自於國家干預程度未能隨經濟成長而有所改變，一開始的經濟干預政策或許是正確的，但是政府的干預並不一定永久有效，隨著經濟發展日漸成熟，金融制度需隨之發展，政策當然應該不同。幾個亞洲開發中國家在 1996 年出口出現疲態，進而影響 1997 年的匯率政策，就是這些國家自食惡果的寫實。本論文將以數個東南亞國家為論證，證明上述理論為真。

◆香港城市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ARC, H.K.)

緣起

香港城市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SEARC) 成立於 2000 年。它是香港第一個以東南亞區域研究為宗旨的研究機構。對香港而言，東南亞是一個在社會、文化、經濟上長期與它相關的區域。由於城市大學認知到愈來愈多的港人想要了解東南亞，也明白以香港為本的東南亞區域研究機構之重要性，於是這個研究中心就在該校應運而生了。

該中心成立的宗旨，是要在香港建立一個世界級的東南亞研究中心。該中心的目標，是在東南亞研究上作出新的、有價值的貢獻，把香港城市大學打造為國際承認的東南亞研究重鎮。

目的

該中心之目的有四：

- 一、發展國際的、優質的研究計畫；
- 二、出版高品質的學術著作與刊物；
- 三、與國際研究人員和機構建立互惠的聯繫網路；
- 四、提升並加強香港的東南亞研究，增進東南亞與香港的相互了解。

主要課題

該中心思索的主要課題是「在全球化的情境下再造東南亞：文化、發展、挑戰」(Remaking Southeast Asia in a global context: cultures, development, challenges)。這個課題透露出以下的意涵：在各種全球化的力量影響下，東南亞區域的社會、文化、國家正被迅速地再造（改造），該中心就是以東南亞區域為研究焦點。同時，該中心也意識到歷史過程的重要性，因為那些過程是當前各種變遷的基礎。該中心也了解到，在這種再造東南亞的過程中，過去、現在、未來是緊密相關的。

研究方向

該中心的研究方向有三：

- 一、東南亞與全球化：環境、人、市場；
- 二、分立、聚合、衝突；
- 三、東南亞的互動：跨界、族群關係。

以上每個研究方向都是由香港的城市大學、其他大學、外國大學等機構中的研究人員來執行。該中心採取一種比較性的、跨學門的觀點來作研究。它的研究試圖涵蓋東南亞社會的各種層面，包括中央與邊緣、城市與鄉村、男性與女性、政府與非政府等。

主要活動

該中心的主要活動包括以下幾項：

- 一，從事新的、開創性的研究；
- 二，與相關的機構建立研究的網路、策略性結盟；
- 三，舉辦國際會議；
- 四，組團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
- 五，舉辦公開演講，工作研討會，專題討論會；
- 六，在各媒體（尤其是網際網路）傳布訊息；
- 七，出版重要的論文、書籍、刊物；
- 八，接待訪問學人。

核心成員

該中心目前的主要成員如次：

Kevin Hewison (教授兼主任)¹

Joseph Cheng 教授

Graeme Lang 博士

¹ Kevin Hewison 教授曾於今年二月間到訪，參加本計畫和英國經濟與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 (Economic &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合辦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and Culture in Global and Local Contexts。他於會中發表一篇論文，題目為 'Bankers,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ailand'，並擔任一個場次的主持人、一篇論文的評論人。

Vivienne Wee 博士

Xiaowei Zang 博士

該中心歡迎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提出申請、造訪。申請的資格（條件）是專長要與該中心的研究旨趣、課題相關。

聯絡對象與方式

對象：Kevin Hewison 主任

地址：Sou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 (SEARC)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tudi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83,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SAR

電話：(852) 2194 2352

傳真：(852) 2194 2353

電子郵件：searc@cityu.edu.hk

網絡：<http://www.cityu.edu.hk/searc>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2001 年台灣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主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協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研討會時間：2001 年 5 月 3、4 日（星期四、五）

研討會地點：南投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研討會主題：危機之後：二十一世紀的東南亞區域研究

- 研討會議題：
1. 東南亞歷史、考古、語言與文化
 2. 東南亞族群宗教社會關係
 3. 東南亞各國的發展問題
 4. 東南亞區域的政經發展
 5. 台灣與東南亞

研討會聯絡事宜：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大學路 1 號

電話：049-2910960 轉 2561

傳真：049-2918541

電子郵件：dseas@ncnu.edu.tw

相關網址：<http://www.dseas.ncnu.edu.tw/>

會後將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網站提供會議論文查詢及下載等服務。

詳細議程

五月三日 10:30 ~ 12:00	
第一場	特別專題演講及座談
會 場：	暨大科技一館第二演講廳
主持人：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主講人：	James Warren, Murdoch University, Australia
論 文：	“Singapore’s Avant-Garde Theatre: New Ways of Viewing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Women in Southeast Asia: A Video Performance of <i>Broken Birds</i>” 〈折翼之鳥：由新加坡影藝尖兵看東南亞的日籍娼妓〉 報告 25 分鐘 影片賞析 45 分鐘 講評、討論 20 分鐘
講評人：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第二場	國際關係與區域安全(1)
會 場：	暨大科技一館第一演講廳
主持人：	翁松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論 文：	(一) 當代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援助政策 柯玉枝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 (二) 曼谷四國軍事會議和李彌部隊撤台事件 覃怡輝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三) 海陸爭霸下東亞安全形勢發展與臺灣的戰略思考 李文志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四) 中共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中共的南海政策 蔡真益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所政治組 (五) 俄羅斯亞太政策與未來俄越關係 呂詠彥 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評論人：	翁松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評論文章 (一)(二)(三) 梁錦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評論文章 (四)(五)

五月三日

13:00 ~ 14:30

第三場 族群／社會專題

會 場： 暨大科技一館第二演講廳

主持人： 麥留芳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論 文： (一) 照本宣科的演員：越南台商廠內工會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王宏仁 淡江大學未來研究組

(二) 商品化跨國婚姻市場：以台越婚姻仲介為例

王宏仁 淡江大學未來研究組

張書銘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三) 族群媒體的社會功能：以服務在台東南亞外勞的廣播節目為例

邱琬雯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四) 泰國國際勞工移動：外來移民所帶來的影響

章少棠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評論人： 麥留芳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評論文章 (一) (三)

龔宜君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評論文章 (二) (四)

第四場 東南亞台商投資及管理

會 場： 暨大科技一館第一演講廳

主持人： 滑明曙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論 文： (一) 從投資與貿易的關連性分析——我國與菲律賓之經貿發展關係

黃兆仁 台灣經濟研究院

(二) 台灣紡織業在越南的投資策略之探討

李 揚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蔡啟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三) 產業變遷下在印尼的台灣紡織業技術勞工生涯抉擇初探

白政民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四) 派外人員人格特質與海外適應之實證研究

——以台商中小企業派駐馬來西亞經理人為例

黃士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評論人： 滑明曙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評論文章 (一)

鍾憲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評論文章 (三) (四)

林欽明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評論文章 (二)

五月三日

14:45 ~ 16:15

第五場 藝術與宗教發展

會 場： 暨大科技一館第二演講廳

主持人： 謝 劍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論 文： (一) 麻六甲都市的文化多重性與其歷史的形成過程
——本土王國的建立與殖民宗主國之統治

黃蘭翔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二) 素可泰時期的美術

嚴智宏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三) 馬來半島早期佛教的發展

陳秋平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

(四) 伊斯蘭主義與現代化：以馬來西亞馬哈迪時期（一九八二年
至一九九九年）巫統伊斯蘭化理念與政策為例初探之

陳中和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評論人： 謝 劍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評論文章 (三) (四)

麥留芳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評論文章 (一) (二)

第六場 政治經濟專題

會 場： 暨大科技一館第一演講廳

主持人： 李國雄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論 文： (一) 從政府、市場和社會的三角關係來解析汶萊的政經發展模式

宋鎮照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陳世倫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二) 緬甸自 1988 年以來的政經發展與前瞻

宋鎮照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高景仲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三) 跨國資本的勞動關係：臺商在馬來西亞的勞動控制

龔宜君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四) 種族科技民族主義與全球化：馬來西亞的困境

張亞中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

陳美萍 馬來西亞南洋商報

評論人： 李國雄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評論文章 (一) (二)

董娟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評論文章 (三) (四)

五月三日

19:30 ~ 21:00

第七場 泰國專題

會 場： 日月潭哲園名流會館國宴廳

主持人： **宋鎮照**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論 文： (一) 泰國憲政改革與民主化之關連

林若雱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林右峰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二) 「惡性循環」再現？1992 年以來泰國政治的變遷

陳佩修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三) 泰國軍人的地位與角色——歷史與理論層面

謝明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四) 現代泰國華人資本的行程——以銀行金融四大家族為例

翁裕洲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五) 泰國經濟不均衡的發展對政治民主化的影響

鄭安貴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陳怡蓉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評論人： **宋鎮照**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評論文章 (一) (二) (四)

陳佩修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評論文章 (三) (五)

第八場 文學／認同

會 場： 日月潭哲園名流會館湖畔碼頭

主持人： **古鴻廷**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論 文： (一) 從個人的體驗到黑暗之心

——論張貴興的雨林三部曲及大馬華人的自我理解

黃錦樹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

(二) 「八代灣的神話」一個台灣南島語族的生態意識

陳月英 淡江大學西洋語文研究所、弘光技術學院

(三) 失落與尋回：《阿都拉傳》與《馬來人的困境》中的馬來人

高英凱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陳佩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四) 建構與重現——從後殖民理論看好萊塢電影《安娜與國王》

謝惠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評論人： **張錦忠**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

評論文章 (一) (二) (三) (四)

五月四日
9:00 ~ 10:30

第九場 亞洲價值與新馬政治

會 場： 暨大科技一館第二演講廳
 主持人： 顧長永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
 論 文： (一) 政治文化與威權體制—兼論李光耀與馬哈地領導風格
 林若雱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二) 人格特質、權力觀、權力轉移——李光耀與馬哈地比較研究
 李美賢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陳丁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三) 馬哈迪的反經濟帝國主義意識—以後金融風暴政策分析
 陳子鸚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四) 2000 年巫統黨選評析
 張曉威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

 評論人： 顧長永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
 評論文章 (二) (四)
 姚朝森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
 評論文章 (一) (三)

第十場 印尼專題

會 場： 暨大科技一館第一演講廳
 主持人： 區鉅龍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論 文： (一) 爪哇地區的「強迫種植制度」：一個政治經濟的觀點
 王遠嘉 四海技術學院
 陳英杰 四海技術學院
 (二) 從經濟觀點看印度尼西亞 1998 新春暴動：
 金融危機、經濟體制與代罪羔羊
 楊聰榮 澳洲國立大學亞洲研究部
 (三) 西巴布亞與東帝汶問題之比較研究
 李建柔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四) 從政治機會結構論印尼「新秩序」政權的轉移
 謝尚伯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評論人： 區鉅龍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評論文章 (一) (二) (三) (四)
 李美賢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評論文章 (三) (四)

五月四日

10:45 ~ 12:15

第十一場 新馬華人政治參與

會 場： 暨大科技一館第一演講廳

主持人： 林若零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論 文： (一) 馬來西亞華人移民的文化偏好、電視消費與收視偏好分析

黃葳威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研究所

(二) 馬來西亞華人選民投票行為之研究——以馬六甲選區為例

官泰發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三) 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參與

侯政宏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四)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研究

王麒銘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評論人： 林若零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評論文章 (一)(二)

古鴻廷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評論文章 (三)(四)

第十二場 國際關係與區域安全(2)

會 場： 暨大科技一館第一演講廳

主持人： 張保民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論 文： (一) 1990 年代越南與美國關係之分析

梁錦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二) 南海衝突與亞太區域安全

梁銘華 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

(三) 1977 年寮國簽署「寮、越友好合作協定」內外因素之探討

鄭曉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四) 中共懲越戰爭之始末

許源派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所

評論人： 張保民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

評論文章 (一)(三)

李文志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評論文章 (二)(四)

五月四日
13:30 ~ 15:00

第十三場 醫療與教育政策

會 場： 暨大科技一館第二演講廳
 主持人： 朱泓源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論 文： (一) 台灣、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健康照護財務比較研究
 ——「國家化」健康照護體系的實踐與存續
 孫友聯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二) 馬來亞地區華文獨立中學發展之研究
 古鴻廷 東海大學通識中心、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三) 有關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研究的觀點剖析
 李寶鑽 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
 (四) 台灣與東南亞華人社會高等教育之比較研究
 ——大眾化、市場化的觀點
 劉永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
 評論人： 朱泓源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評論文章 (二) (四)
 古鴻廷 東海大學通識中心、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評論文章 (三)
 古允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行政系
 評論文章 (一)

第十四場 宗教專題

會 場： 暨大科技一館第二演講廳
 主持人： 蔡源林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論 文： (一) 東南亞伊斯蘭：邊際化、差異性與共同性
 麥留芳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謝杏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二) 從後殖民觀點看馬來西亞的伊斯蘭化
 蔡源林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三) 砂勞越華人社團與宗教的互動關係
 鄭志明 輔仁大學宗教系
 (四) 重暢共生之懷！華人儒家與馬來穆斯林對話的形上學基礎
 鄭文泉 中央大學哲學系研究所，圓光佛學院
 評論人： 麥留芳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評論文章 (三)
 蔡源林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評論文章 (一)
 曾慶豹 中原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評論文章 (二) (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提供)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辦公室報導

壹、會議

一、本計畫於2001年2月5日(星期一)與本院歐美研究所合辦「台灣與南海地區之衝突管理」圓桌學術討論會(Taiwa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Roundtable Discussion)。相關的會議情況，請參閱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宋燕輝於本刊(本期)發表的〈「台灣與南海地區之衝突管理」圓桌學術討論會會議召開情形報告〉一文。

二、本計畫於2001年2月15-16日(星期四—星期五)與英國經濟與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Economic &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合辦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and Culture in Global and Local Contexts。會中有來自美國、英國、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等國家或地區以及我國的學者專家共二十餘位。

本計畫主持人蕭新煌教授於會中與台大社會系陳東昇教授聯名發表“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of Taiwan's enterprises in Malaysia and Indonesia”論文。蕭教授還與大業大學工業關係系張景旭教授聯名發表“Taiwanese Business and the Chinese Managers in China: The Case of Xiamen”論文。蕭教授又與台大社會系

曾熾芬教授聯名發表“Labor Control in Local and Global Contexts: Taiwanese Firms in Southeast Asia”論文。

三、本計畫於2001年3月26-27(星期一—星期二)主辦Parties, Leadership, and Governanc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 Comparative Study研討會。會中有來自美國、日本、澳洲、英國、愛爾蘭、法國等國家的專家學者數位。

本計畫主持人蕭新煌教授於會中與Robert Weller教授聯名發表論文，題目為“The Dynamics of Civil Associations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四、本計畫於2001年4月26-28日(星期四—星期六)與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本院社科所、近史所、民族所、東北亞計畫等單位合辦「第四屆世界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中，本計畫的諮詢委員王賡武院士作了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題目為“New Migrants: How New, Why New?”。

其次，本計畫於會中單獨組成兩個panel，一為「馬來西亞華人人物評論」，主持人是蕭新煌教授。三位論文發表人來自本計畫在馬來西亞的合作對象：(一)林水椽教授，題目為「功

在社會的馬來西亞華裔儒商」；(二) 何啟良教授，題目為「馬來西亞華人政治人物：意識、繼承和類型」；(三) 何國忠教授，題目為「馬華文學作者的身份危機」。

另一個為「新加坡華文教育史」，主持人是本計畫訪問學人麥留芳教授。三位論文發表人來自本計畫在新加坡的合作對象：(一) 魏維賢教授，題目為「獨立前新、馬華文教育所面對的挑戰與反應」；(二) 崔貴強教授，題目為「從『中國化』走向『馬來亞化』—新加坡華文教科書的嬗變—1946-1965」；(三) 莊欽永教授，題目為「1819-1844 新加坡的華文學堂」。

再次，於其他 panel 之中，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朱泓源教授發表「華僑相對論：從國到境」論文；本計畫合作計畫主持人龔宜君教授發表「跨國投資與族群資源：東南亞台商與華人幹部」。曾經擔任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的張存武教授發表「對中國海外移民的多角度思考」，同樣曾經擔任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的張珣教授發表「海內外媽祖研究的探討與比較」。

此外，王賡武院士、朱泓源教授、林水椽教授、魏維賢教授又分別擔任一至二個場次的主持人。王賡武院士、朱泓源教授、林水椽教授、魏維賢教授、崔貴強教授、莊欽永教授、何啟良教授、龔宜君教授、本計畫合作計畫主持人王宏仁教授、本計畫博士後研究學者嚴智宏等也各擔任一至三篇論文的評論人。

貳、出版品

「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PROSEA Research Paper Series)新增三篇論文，作者與題目如下：

- No.42 Anthony Reid:
Aceh and Indonesia: A Stormy Marriage
- No.43 Robert R. Reed:
In Quest of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Conditions Underlying Migra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Beyond
- No.44 Jomo Kwame Sundaram:
What's Different about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m?

參、專題演講

本計畫於 2001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一) 10:30-12:30 舉辦專題演講。主講人和題目分別為張錫鎮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學系教授)：中國大陸的東南亞研究；王逸舟(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新世紀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

肆、午餐研討會

2001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二)：Dr. Tana Li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Australia)：The Late 18th Century Mekong Delta and Its World of Water Frontier

伍、活動預告

「2001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 年度研討會」

時間：2001 年 5 月 3-4 日（星期三—星期四）

地點：南投縣埔里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附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本計畫、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協辦



2 月 15~16 日 • 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and Culture in Global and Local Contexts



2 月 19 日 • 專題演講

張錫鎮教授：中國大陸的東南亞研究、王逸舟教授：新世紀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
王逸舟教授（左起）、張錫鎮教授、林若雱教授、蕭新煌教授



4 月 24 日 • 午餐研討會

Dr. Tana Li: The Late 18th Century Mekong Delta and Its World of Water Frontier

2001 年 5~8 月

東亞及東南亞研究相關會議時間表

五 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14~16	ESF Workshop: Labour Mig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地點：Copenhagen, Denmark 主辦單位：(1)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NIAS) (2)Center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Lund University 聯絡地址：(1)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NIAS), Leifsgade 33, DK 2300 Copenhagen, Denmark (2)Center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Lund University P.O.Box 792, 220 07 Lund Sweden 電子郵件：(1)Michael.Schoenhals@ace.lu.se (2) Per.Ronnas@nias.ku.dk 相關網址： http://eurasia.nias.ku.dk/gems/info/MigrationConf.doc
21~22	Sanskrit in Southeast Asia The Harmonizing Factor of Cultures	地點：Bangkok, Thailand 主辦單位：Sanskrit Studies Centre Silpakorn University 聯絡人：Dr.Chirapat Prapandvidya 聯絡地址：Sanskrit Studies Centre Silpakorn University 22 Boromarachachonnani Road Taling Chan, Bangkok 10170 Thailand 電話：(662) 8807374 ext. 2801 (662) 2226818 傳真：(662) 2265355 電子郵件：chirapat@su.ac.th

六 月		
日 期	會 議 名 稱	相 關 訊 息
6~7	Participato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Local Knowledge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 in Southeast Asia	地 點：Chiang Mai, Thailand 聯 絡 人：Prof. Franz Heidhues 聯絡地址：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Tropics and Subtropics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490A) 70593 Stuttgart, Germany 電 話：(49) 700 459 3934 傳 真：(49) 700 459 3934 電子郵件：heidhues@uni-hohenheim.de
11~13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Studies 14 th Annual Conference	地 點：Seinäjoki, Finland 主辦單位：Associ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Studies(AJBS) 聯 絡 人：Ville-Pekka Makelainen 聯絡地址：Seinajoki Polytechnic Business School Koulukatu 41, FIN-60100 Seinajoki, Finland 電 話：(358) 40 830 4179 傳 真：(358) 201 245 459 電子郵件：ajbs@seamk.fi 相關網址：http://ajbs.seamk.fi/
27~30	Japa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Biennial Conference 2001	地 點：Sydney , Australia 主辦單位：Department of Japanese and Kore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聯 絡 人：Louise Walton 聯絡地址：The JSAA Conference Committe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and Kore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Sydney 2052 Australia 電 話：(61) 2 9385 3760 傳 真：(61) 2 9385 3760 電子郵件：l.walton@unsw.edu.au 相關網址： http://www.arts.usyd.edu.au/Arts/departs/asia/jsaa/index.html

七 月		
日 期	會 議 名 稱	相 關 訊 息
5~6	The 3rd Annual Meeting for the Vietnamese-North American University Professors (VNAUP) Network	地 點：San Jose, USA 主 辦 單 位：Vietnamese-North American University Professors (VNAUP) 聯 絡 人：(1)Prof. Thinh Dinh Ngo (2)Prof. Vo Van Toi 電 子 郵 件：(1)ngothinh@csus.edu (2)vanvo@eecs.tufts.edu
7~17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Vietnam	地 點：Hanoi/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主 辦 單 位：The Vietnam-USA Society(VUS) 聯 絡 地 址：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International Faculty Development Seminars Dept. 633 Third Avenue, 20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USA 電 話：(1) 212 822 2747 電 子 郵 件：ifds@ciece.org 相 關 網 址： http://www.ciece.org/ifds/Seminars/Vietnam.htm
12~13	Second Australian National Thai Studies Conference	地 點：Melbourne, Australia 主 辦 單 位：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MIT) 聯 絡 人：(1)Mike Hayes (2)Peter Jackson 電 子 郵 件：(1)mike.hayes@rmit.edu.au (2)peter.jackson@anu.edu.au
18~21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Journal Antropologi Indonesia — Globalization and Local Culture: A Dialectic towards the New Indonesia	地 點：Padang, Indonesia 主 辦 單 位：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Facul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Andalas University 聯 絡 地 址：PO BOX 166, Padang West Sumatera, Indonesia 電 話：(62) 751 71266 傳 真：(62) 751 36645 電 子 郵 件：intsimp_antro@yahoo.com 相 關 網 址： http://www.jurnal-ai.net
八 月		
日 期	會 議 名 稱	相 關 訊 息
6~8	Third International Malaysian Studies Conference (MSC3)	地 點：Kuala Lumpur, Malaysia 聯 絡 人：Mr Foo Ah Hing 聯 絡 地 址：MSC3 Secretariat

		(Att: Mr Foo Ah Hing)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79593606 傳真：(603) 79567252 電子郵件：hlfoo@umcsd.um.edu.my 相關網址： http://phuakl.tripod.com/pssm/homepage.htm/
8/30~ 9/1	The Sixth Nordic Symposium for Japanese and Korean Studies	地點：Oslo, Norway 主辦單位：The Nordic Association for Japanese and Korean Studies (NAJAKS) 聯絡人：Reiko Abe Auestad 聯絡地址：Dept. of East European and Oriental Studies P.O.Box 1030, N-0315 Oslo Norway 傳真：(47) 22 85 4140 電子郵件：najaks@hotmail.com
8/31~ 9/1	Governance, Identity and Conflict: Assessing on the Impact of Democratisation, Decentralisation and Regional Autonomy on Stabil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地點：Copenhagen, Denmark 主辦單位：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NIAS) 聯絡人：(1)Michael Jacobsen (2)Timo Kivimaki 電子郵件：(1)Jacobsen@nias.ku.dk (2)timo.kivimaki@nias.ku.dk 相關網址： http://eurasia.nias.ku.dk/workshop2001/

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第十三期 2001.04

主 編 蕭新煌
執行編輯 嚴智宏 戚常卉
編 輯 簡心怡 林淑慧
發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地 址 115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電 話 (02) 27822191, 27822195, 26516862
傳 真 (02) 27822199, 26516863
網 址 <http://www.sinica.edu.tw/~proseaw3>
<http://www.sinica.edu.tw/~isear>
電子郵件 prosea@gate.sinica.edu.tw